

Inner Exile:
The Psychic Landscape of Incest Trauma

Jen-Yu PENG

放逐於自身之外：
亂倫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

彭仁郁

非常感謝這篇研究論文的主要受訪者蛤仔，這四年來努力地幫助我理解她。也謝謝她仔細地閱讀這篇文章的初稿，不吝給予意見，她是我最重要的審稿人。這個企圖尋求跨學科對話、在方法論和認識論立場上處於邊緣位置的亂倫主體經驗研究，受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音聲發微研究群前輩的理解和鼓勵，值此臨床精神分析於學院內妾身未明的尷尬處境，顯得分外寶貴。本研究初期受到筆者當時的助理沈寶莉小姐的大力襄助，隨後承接助理工作的魏瑄慧小姐亦付出許多精力和熱忱，令人感佩。此外，十分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不吝賜予寶貴意見和切要建議，協助補正本文論點，在嚴肅的審稿過程中促成了誠摯學術交流的可能。研究經費上部分受到科技部性別與科技專題研究計劃補助的支持（計劃名稱「亂倫創傷主體的性別自我認同及能動性」，編號MOST(103-2629-H-001-001)），在此一併致謝。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國分析空間(Espace Analytique)學會精神分析師

電子信箱：jenyup@gate.sinica.edu.tw

摘要

亂倫性侵犯創傷在主流精神醫學和臨床心理學的實證論述框架中，經常被簡化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然而，已有許多醫學人類學和臨床實務研究指出，忽視主體歷史脈絡和殊異性的標準化診斷，往往造成令心理創傷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弔詭。然而，不可見的心理創傷如何被看見？

精神分析對於心靈真實(psychic reality)的重視有助於超越精神病理學的限制，透過揭露主體無意識欲望的夢和自由聯想，以象徵隱喻的方式貼近創傷真實。只不過，自幼長期受創的後果之一即為夢的缺乏和聯想的不自由。基於長年針對亂倫創傷主體進行的「臨床田野」研究，本文嘗試提出「心靈地景」(psychic landscape)概念，作為窺見亂倫心理創傷樣貌的媒介。

對亂倫創傷主體而言，作為自我認同基礎的「家」，經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衝突對立面構成。後果是倖存者裂解的自我被驅逐至一個無外在可逃離、無時無刻被監控的「內在放逐」(inner exile)狀態。此種無法言說的恐怖，外顯為令人不解、而易被精神病理化的症狀。本文將以一個與亂倫創傷主體遭逢的田野日誌為例，說明精神分析式的聆聽如何協助創傷主體揭露自身創傷與欲望混織的心靈地景，而此地景又如何可能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傳移(transference)關係中轉化。

關鍵詞：亂倫創傷、心靈地景、內在放逐、臨床田野、心靈真實

Abstract

Contemporary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generally frame the incest trauma within the positivist discours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This categorizatio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a tendency to pathologize and medicate psychotrauma. However, the standardized diagnostic reasoning may render the trauma invisible to the professional eye. In practice, due to the ineffability of incest trauma, victims are often subjected to different diagnoses of mental illness (schizophrenia,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s, etc.). For how can psychological trauma be seen or conceived? From a psychoanalytical perspective, and based on “clinical fieldwork” (Peng 2014a) on incest trauma over a decade, the author advances the notion of the “psychic landscape” to illustrate the power of imagery metaphors as a means to access to the subject’s inner experience.

For many incest survivors, “home”, the presupposed fundamental space for constructing self-identity, is constituted of ambivalent representations that often combine one element with its very opposite: for instance, persecution-attachment, betrayal-demand for loyalty. Th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survivor’s self is forced into a state of “inner exile”, in which the split self is permanently monitored and there is no “outside” to flee to; i.e., the subject is deprived of authority over her/his own psychic territory. The extreme terror of inner exile can manifest itself in puzzling symptoms, such as inexplicable fear, global anxiety, somatization, dissociation, lying, repeated victimization, etc. Taking a Taiwanese incest survivor’s ca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ransferenc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traumatic psychic landscape emerges. By doing so, the author reiterates the need to go beyond the pathologizing tendency in contemporary psychiatry and bring the psychic reality, or subjective truth, back into focus when approaching psychotrauma.

Keywords: Incest trauma, Psychic landscape, Clinical fieldwork, Inner exile, Psychic reality

airiti 一、楔子

第二次訪談的尾聲，到了跟蛤仔¹道別的時刻，見面起一直表現得十分拘謹守禮的她，突然提出一個令人不知所以然的要求：「把手給我」。

我心想：她是想握手道別吧？但為何我隱約感到一絲近乎命令、不容拒絕的堅持？而這口吻，又彷彿是想讓我看一樣她藏在地窖裡不知多少年的秘密。

應該是為了解除她伸出的右手繼續停留在半空中的尷尬，我伸出了我的。接著，我的右手掌迅雷不及掩耳地被帶向了蛤仔的左胸口，重重的按壓在介於鎖骨和乳房之間的位置，旋即啟動了一整片我不確定她是否真正準備好讓我看見的過去。（2012年2月5日田野日誌）

最初，蛤仔是我透過部落格尋找到的研究訪談對象。嚴格說來，應該是她先找到我。2010到2011年之間，當時的研究助理協助我設立了一個部落格——「亂倫性侵研究所」²——在版上刊登家內性侵受害者主體經驗研究的訪談邀請，也同時作為亂倫性侵相關新聞資料的蒐集中心，希望逐漸發展為相關議題的交流平台。

2011年底，我收到大學剛畢業不久的蛤仔一封內容極為理性的電子郵件，表示想要參加我的研究訪談，希望自己的經驗有助於社會大眾及專業

1 這個匿名代稱是受訪者自己的選擇，她曾在2012年年末的一幅畫裡，用蛤仔象徵自己。底下是她2013年「逃亡」（離家）期間寫下的說明：

蛤仔看起來很堅強，實際上，它是很脆弱的，所以才需要用硬硬的殼包住它軟軟的肉；蛤仔很害羞，所以平常都躲在它硬硬的殼裡。要讓它伸出舌頭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靜靜的『等』。等夠久，直到蛤仔覺得夠安全了，它就會伸出舌頭來了。如果要用暴力的方法打開蛤仔而煮它，煮了它，殼不一定會打開；煮了它，有可能你只會得到一枚死掉的蛤仔。你只能夠等，等蛤仔很慢很慢的吐著舌頭，很慢很慢的把沙子吐光光，或許到那一天，蛤仔會發現自己不是蛤仔，而是蚌。蚌殼夠堅固，能夠好好地保護自己；蚌產珍珠，意即我有我的特別之處。但請不要嚇我，要不然蛤仔會閉嘴的。

2 網址為<http://incestrapestudy.blogspot.tw>。

助人工作者更能了解此創傷經驗的特殊性和複雜性。蛤仔信裡透露出高度參與意願，但是對於自己能否確實為研究帶來助益仍有疑慮，也不確定自己的情況是否符合研究需求。³為了澄清她的疑慮，我建議先約時間見面做初步會談，不須立刻決定是否參與研究。我們決定相約在她工作所在的S城。⁴

第一次見面，蛤仔予人聰穎、害羞、靈活、體貼又亟欲助人的印象。她訂了一家近高鐵站的咖啡廳，讓我免去舟車勞頓。在簡單的相互自我介紹之後，她以事後看來是保護色的幽默口吻，訴說她從小經歷的煉獄。煉獄是我的形容，對於直接經歷其中的蛤仔自己來說，不管是肢體虐待、口語暴力、性侵、情感要脅、恐嚇、心理操控，乃至父母對她情感上的拋棄和工具化使用，這些對於一般人來說的煉獄狀態，對她而言，直到考上大學、離家求學之前，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亦即「正常」狀態。

因了解亂倫創傷主體建立信任關係的困難，我通常設定初次見面或電話交談的目的在彼此自我介紹，說明研究主旨和訪談進行方式，待確定對方參加意願後，才會進入正式訪談和錄音。然而，蛤仔自見面起便十分盡職地扮演受訪者的角色，簡單相互介紹後便開始對我訴說受虐的情況。我正表示有點可惜，這些重要的話都沒有錄下來，她立刻從背包裡拿出她自己的錄音筆，然後按下錄音鍵。弔詭的是，過程中，蛤仔談到她對人信任的困難，甚至為了保護自己經常對他人顯露敵意，好讓人不敢接近：「我跟一個人開始講話通常要觀察半年以上，標準程序就是，好，我跟你講ok，通常要觀察半年。」⁵如何理解這個宣稱和行動之間的矛盾？事後看來，蛤仔初次訪談內容所呈現的近乎樣板化的亂倫家庭敘事，正是一種尚未信任的表現。在蛤仔簡略的原生家庭史描述中，我得知她的母親自己是

3 研究者經常遇見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自己的受害情況是否符合亂倫性侵的範疇感到疑惑，這透露著亂倫性侵受害者自我認定、命名受害經驗的困難（Peng 2009）。

4 從2012年初至今，我與蛤仔見面次數超過100次，談話（含電話與網路視訊）總次數超過200次，交換的email超過400封。許多細節因篇幅限制不得不割捨。本文僅根據討論主軸，呈現一小部分田野訪談及筆記內容。

5 2012年1月18日訪談紀錄。

父親家暴的受害者，但母親和其他家人⁶似乎把蛤仔承受的肢體暴力理解為比較嚴厲的「管教」，而對她曾試圖揭露的性侵情節則採否認態度。⁷

結束後，蛤仔堅持陪我走到高鐵站搭車。臨行前，我再次向她致謝，告訴她，我了解對陌生人透露這個隱忍多年的秘密需要極大的勇氣。她抓住這個機會希望問我最後一個問題⁸：「依你的經驗，這樣的傷要多久才會好？」當時我未能估量這問話背後的求助含義，只說了些「傷害愈深需要的復原時間愈長，需要對自己有些耐心，只要不放棄，就有機會」之類的鼓勵話語。說的同時，我不自覺地伸手輕觸了她的左上臂一下，她的整個身體瞬間如觸電般緊縮、顫抖。我輕聲問她「還好嗎？」她羞愧地回：「還好，對不起……」跟剛剛坐在咖啡廳裡侃侃而談的精明幹練，判若兩人。

蛤仔顫抖的身體下埋藏的創傷記憶，和那宛如層層通電、鐵絲網般將她牢密地封鎖其中、卻又弔詭地將她的自我驅逐出境的內在牢獄，要待往後四年的「臨床田野」（clinical fieldwork，彭仁郁 2014a），才逐漸展陳在我和她自己的面前。本文嘗試以精神分析的視角，透過蛤仔的「內在放逐」（inner exile, Laub 2013）——更準確地說，被亂倫暴力放逐在自身之外——的臨床田野民族誌書寫，發展創傷「心靈地景」（psychic landscape）概念，以豐富對亂倫暴力創傷主體經驗的深層理解。

二、研究目的、取徑和問題意識

（一）女性主義臨床工作者的未竟之業

亂倫性侵議題受到社會和學界的重視，較家庭外性暴力所引發的關

6 在這個時候，我尚未得知蛤仔的母親來自其他亞洲國家，來臺灣求學時結識蛤仔的父親，婚後夫妻住在父親老家大家庭中，直到蛤仔升小學四年級暑假，才與父母和弟弟一家四口遷出。

7 經過後續的訪談得知，蛤仔在大學時期曾在被動情況下承認自己是亂倫性侵受害者，家人對此的一貫說法是蛤仔的精神疾病讓她產生被家人迫害的妄想。

8 在後來延續三年多的談話裡，詢問「最後一個問題」幾乎變成是個結束談話前的儀式。

注晚了將近20年。1970年代起，因著歐美女性主義運動者的呼籲和抗爭，使得過往為父權社會結構所默許，以男性為主要加害者、女性為主要受害者的性暴力，逐漸被視為道德和法律層面上皆應受制裁的非法行為(Zophy and Kavenik 1990; Vigarello 2000)。而亂倫性侵（或家內性侵）的事實，則要到1990年代之後，在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和臨床實務工作者的堅持之下，才讓她們在診療室中反覆聽見的真相，受到社會的正視(Herman 2000; Courtois 1996; Finkelhor et al. 1990; Julien and Saint-Martin 1995; Rivera 1999; Peng 2009)。這些臨床實務工作者曾面臨來自專業領域內、外激烈的質疑和抨擊，其中包括了將亂倫現實混淆為「女性伊底帕斯情結典型幻想的表現」(Freud 1984: 162)的古典佛洛伊德學派精神分析學者，以及將潛抑多年後返回意識的創傷記憶斥為「虛假記憶」(false memory)⁹的認知心理學家（如Loftus and Pickrell 1995¹⁰）。

歐美這波隨著「個人即政治」的女性主義運動訴求而萌發的對於亂倫性

-
- 9 美國在1990年代，被指控性侵子女的父母們建立了一個「虛假記憶症候群基金會」(False Memory Syndrome Foundation/ FMSF)，以協助這些父母處理子女的提告，或對子女的心理治療師提出訴訟，反控心理師將亂倫性侵的「虛假記憶」「植入」子女大腦中。此基金會積極串連不認為重大創傷記憶可能被潛抑的認知心理學家，並自行創發沒有科學研究基礎的「虛假記憶症候群」(FMS)，作為替亂倫性侵案被告人辯護的律師在法庭上主張的反辯論點。直至1990年代後期，這個偽精神疾病名稱在北美法庭上對判決發揮了顯著的影響力。例如1999年加拿大曾有法庭實務研究指出，在審理過程中FMS曾被專家證人引述作為推翻原告證詞科學依據的性侵案件裡，超過90%的法官都接受了FMS的說法而駁回告訴(Kelly et al. 1999)。
- 10 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等人以「迷失在大型商場裡」等主題所做的關於虛假童年創傷記憶的外部植入可能（或可暗示性）的研究，在學界引發許多爭議，這些爭議包括研究倫理的違犯、研究設計的瑕疵和研究結果的過度外化解釋等(e.g., Crook and Dean 1999)。我認為這類試圖證明創傷記憶可以被假造，並透過受試者信任對象（在此例中為親屬）的暗示，「植入」受試者大腦的認知心理實驗研究，在亂倫性侵的情況裡不具說服力的原因是，絕大部分的亂倫性侵是在信任關係中發生，而絕大多數的加害者否認暴力的真實性，透過情感要脅要求受害者將性侵認知為「一種愛的表達方式」，並且，當受害者的創傷記憶在經歷時間長度不等的潛抑狀態再度浮現時，當事人父母經常將性侵記憶內容斥為憑空幻想，甚至是精神疾病所導致。換句話說，在亂倫性侵發生的家庭中，受害者反而被鼓勵遺忘性侵(Peng 2009)。另有認知心理學者提出，童年期發生的亂倫性侵記憶的潛抑現象，恰是因為受害者在無意識層次難以接受亂倫性侵中親子間基本信任關係被照顧者背叛而觸發(Freyd 1996)。

airiti

侵真實的社會意識提升，促使相關心理、社工、醫護、司法專業處遇制度的設立和普及化。臺灣在童年期性侵相關議題的處遇上亦受惠於此風潮，從1990年代末起，在民間組織敦促下，政府開始推動性侵害防治政策，陸續建立了具有性別平權敏感度的專業處遇制度，很大程度上亦增進了性侵創傷的社會肯認。¹¹然而，相對於臺灣社工和心理諮商處遇現場為數不少的個案量而言，在學術研究上，家內性侵或亂倫性侵在臺灣堪稱十分邊緣的研究主題。倘若從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補助的性侵相關研究看來，直到104年度之前，沒有任何亂倫性侵研究計劃獲得補助。若把查詢範圍擴大至各種性侵害研究，在科技部補助的研究計劃中，大多傾向加害者犯罪人格心理學、大腦神經學研究，受害者心理治療療效研究，性侵害防治、通報機制研究等，幾乎不見以受害者或加害者主體經驗作為研究焦點者。¹²

再者，自2010年起，我在臺灣尋找亂倫性侵受害者或倖存者訪談對象的過程中屢屢觀察到，處境最困難、也因而最需要救助的案主，不一定總是能獲得適時與適切的幫助，且越是困難的案主，往往越是難以被體制內的救助體系承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創傷外顯症狀越嚴重的案主往往被轉介到精神醫療機構，但主流醫療機構的處遇和介入方式通常以症狀消除為主要目標，而使得更切要的主體創傷經驗退居附屬地位。

本文首先檢視主流精神醫學視框病理化、標準化心理創傷的傾向，如何在限制亂倫創傷研究觀點的同時，也可能連帶地造成不同環節的臨床工作者被迫忽略創傷主體內在真實，因而難以為創傷主體提供療癒所需的護持(holding, Winnicott 2000)和涵容(containing, Bion 1984)。其次，本文將重訪精神分析的心靈真實(psychic reality/ la réalité psychique, Freud 2001;

11 但真正針對性侵受害者心理需求而設計的司法、醫學、社工、心理多方位處遇服務，要到2009年才正式開始起步，仍有許多問題待解決。參見黃翠紋(2013: 44-45)文中對臺灣性侵害被害人保護政策進展的說明。

12 可參見科技部（國科會）近20年來補助相關研究計劃之主題分配情形。另，陳慧女、林明傑(2007)曾分析了1985至2006逾20年臺灣性侵害相關實證研究的脈絡和趨勢，發現這類研究來源以碩博士論文為主、以犯罪防治領域占多數。我在回顧文獻時亦發現，以受害者主體經驗作為研究主題者幾乎由碩士論文包辦。

Chouvier and Roussillon 2004) 概念，討論它如何提供了一個有助於超越純粹症狀病理學、貼近心理創傷場景的路徑，但也同時指出這借由夢與自由聯想的隱喻和換喻作用揭示創傷主體欲望的路徑，在極度暴力創傷主體的情況裡可能遭遇的瓶頸。文章將接續說明「臨床田野」（彭仁郁 2014a）作為一種結合精神分析與人類學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如何可能突破上述心理創傷研究典範和理論視框的限制，帶來觀看創傷主體經驗的新視野。最後，蛤仔與我歷時四年的研究關係的局部田野紀錄呈現與分析，一方面有助於進一步深化臨床田野跨學科方法的意涵，一方面則欲凸顯從亂倫創傷臨床田野所發展出的「心靈地景」概念，如何可能藉著與既存精神分析理論的辯證對話，賦予研究者、臨床工作者，乃至創傷主體自身，一個撥開症狀濃霧、看見創傷心靈真實的可能視角。

（二）心靈地景作為瞥見創傷心靈真實的媒介概念

本文提出的心靈地景概念的雛形乃源自與創傷主體長期對話的過程。與蛤仔的田野晤談過程中發生的重要對話事件，尤其揭示了想像的圖像或許更能捕捉創傷主體心靈真實內難以言詮的情緒經驗和感受。而在創傷主體無法運用想像或聯想時，精神分析情境中分析師將自己的身體感受和想像「借」給對方「使用」的臨床技巧，可促使研究受訪主體僵滯或封存的想像空間重新流動。

將「地景」一詞作為描繪心靈真實媒介概念的適用性，需要進一步斟酌。地景不僅指涉外顯可見的地貌而蘊含空間性，亦強調形成地貌的歷史時間性：地景乃不同時期，隨著土壤特性、氣候、地質作用、人類活動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而逐漸構成的特殊地形。事實上，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在建立描繪心靈裝置的第一拓樸（意識－前意識－無意識）和第二拓樸（本我－超我－自我）時，運用了相當多的空間意象，甚至以地質學和考古學詞彙作為心靈空間意象的譬喻，指涉個人生命史與物種生命史的多層次異質沈積。

然而，心靈地景一詞的出現則相當晚近。在既有當代精神分析研究文獻中，曾零星出現以詩意修辭手法使用這個詞彙的文章，但並未被提升到

概念層次。舉例來說，波諾維茲(Bonovitz 2009)探討跨族群病人如何受到歷史創傷或社會建構的族群階序態度的交互影響，而可能形成裂解的內在自身狀態(self-states)，此裂解的難以協商，往往令主體難以承擔內在的衝突；心靈地景僅在文章開頭出現一次，便沒有任何後續討論。奧斯汀(Austin 2009)的文章，主旨在論證後容格學派提出的後社會建構模式自體(Self)概念，並非如一般論者所認知僅包含向心現象（即關注自體如何統整及合一），離心現象在此概念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按前後文脈絡，心靈地景或內在地景，在此僅作為暗示自體空間性的附帶意象。此外，亞倫斯(Arons 2005)這一篇描述臨床療癒實踐的文章，主要在討論居家親子心理治療如何能幫助童年曾有受創經驗且成年時期出現創傷解離症狀的母親，逐步形成穩定的母性內在客體，以便處理自身被拋棄的恐懼、分離焦慮等負面情緒，並改善與下一代親子依附問題，避免創傷的代間傳承；文章中心靈地景一詞，被使用來當作情緒、內在表徵和幻想進行展演的內在空間。¹³上述三篇文章中，隱約可見心靈地景被用來描繪一個得以容納自體，或驅力、情緒、表徵、內在客體等主體內容物的心靈空間，但皆未有理論或概念化心靈地景的意圖，這恰好是本文的動機之一。

當代精神分析學術著作中較深刻地闡發心靈地景意涵的，要算是詩人暨資深精神分析師愛麗絲·瓊斯(Jones, 2015)發表在《美國意象》(*American Imago*)¹⁴期刊上的論文。在比較奚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和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 1931-2015)詩作中的心靈地景後，瓊斯認為，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詩人詩作中滿佈意識與無意識、生與死、自我與他人、內在與外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等多重邊界相互滲透的意象，充分體現了溫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過渡現象」概念中介於主、客體，真實與幻想交界的經驗世界，這也正是令創作蘊生的中介空間或潛在空間。

13 感謝審查人之一提醒我必須針對上述三篇精神分析相關文獻對於心靈地景一詞的隱喻使用進行討論。

14 跨人文社會學科精神分析學術期刊。前身為《意象》(*Imago*)，1912年由佛洛伊德創刊於維也納。1939年，因納粹對歐陸精神分析學園的迫害，佛洛伊德在漢斯·匝克斯(Hanns Sachs, 1881-1947)協助下，以新刊名重新在美國發刊。

在此意義上，瓊斯與筆者試圖發展的心靈地景概念不謀而合。不過，瓊斯主張，詩作本身提供的心靈地景詩意空間，成為作者與讀者接合的跨時空介面，重新喚醒讀者被遺忘或潛抑的過渡經驗。我則傾向認為，文本所給定的具有過渡或中介性質的心靈地景，未能準確捕捉複數主體（如研究者與受訪者，或分析師與分析者¹⁵，也可以是主體與多重自身）透過言說實踐而共同草擬的心靈地景。倘若詩人的天才在於有能力發動與多重自身的對話，創造出揭露普遍心靈真實的詩意空間，進入臨床田野關係的研究者和受訪主體，是在雙向傳移關係中彼此誘發作詩或描繪心靈地景的潛能。

換言之，本文所欲勾勒的是在主體間際(intersubjective)關係中逐漸展露的心靈地景。更接近此意涵的，是人文地理學家米雷婭·缶爾區－瑟拉(Mireya Folch-Serra)透過闡述俄羅斯符號學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理論中隱含的「對話地景」(dialogical landscape)概念，重新反思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論的論文。首先，缶爾區－瑟拉爬梳人文地理學中對於地景「可見性」(visibility)的著重，而延伸出將其視為可閱讀、詮釋的文本理論傳統。接著，她試圖將此傳統與巴赫汀以對話論為基礎的地景概念做銜接，重申對於空間的視覺感知，必須透過言說描述而能成為心靈真實，這使得地景概念不再只是測量繪製的地理客體，而是被有限的眼睛「閱讀」後銘印在空間中的主觀真實。簡言之，一個可被指認的地點(locality)是在敘事中所生成。如此即導出以下推論：倘若，自傳之於人的實際生活，乃是透過描述而形構成序列的生命事件（時間性）；大自然經由言說描述之後，則被塑形(shaped)為具圖像隱喻性質的地景（以空間性為顯著特徵，但亦包含時間性）。當被描繪之後的地景開始反過來獲得了隱喻功能，對話地景中「敘說的可見」(narratively visible)便超越了「圖像的可見」(graphically visible) (Folch-Serra 1990: 258)。另一方面，巴赫汀對話論的重點亦在強調真實（地景）並非由單一言說者擁有，而是居於進入對話

15 相對於早期精神分析把進入分析關係的病人視為分析對象或被分析者（英analyzed / 法analysé），當代精神分析傾向以「分析者」（英analysand / 法analysant）一詞取代之，以彰顯分析者在分析情境中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關係的複數言說者之中。此外，巴赫汀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或複音(polyphony)概念，更提醒了每個言說者所見之真實皆因其不可取代的獨特位置而無法複製，主體需要異己者協助拼湊真實的樣貌（不同角度觀看獲得的地景）；並且，主體自身之中即蘊含多重言語或聲音，令其處於不斷移動、協商、整合的流動不居狀態，因而不存在所謂中立、無人稱、單數、全一的真實。

本文希望藉著心靈地景概念意涵的思索，豐富古典精神分析兩大拓樸的樣貌，使之跳脫「心靈裝置」機械式的意象，並且能夠呈現與重要他者（原初客體）交互關係的歷史作用。然而，必須先申明的是，心靈地景的浮現只是朝向創傷療癒可能的第一步，而不是終點。

三、既存亂倫性侵心理創傷觀點的瓶頸

（一）主流精神醫學看待心理創傷的標準化病理視框

在美國支持退伍軍人權益組織、精神醫學專家和實務工作者的推動下，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病統計暨診斷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開始納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有別於DSM中其他疾病標籤，PTSD是手冊中唯一將病因——自身面臨死亡威脅或目睹重要他人死亡的重大創傷事件——納入診斷標準的精神疾病。¹⁶事實上，這個在短短20年間幾乎成為創傷心理效應代名詞的PTSD診斷標籤，已經在醫療人類學、文化研究領域，甚至是精神醫學內部引發諸多批評(Corcus 2011; Young 1995; Crocq 2000)。由於整部DSM自第四版以降選擇了生理心理反應的症狀描述模式，因而將不同創傷事件（無論涉及人為暴力或自然災害）視同為超出一般人可承受範圍的壓力因

16 直至DSM第四修訂版之前，PTSD包含三個症狀叢集（記憶入侵、迴避及麻木、過度警覺），DSM第五版將上述第二個叢集拆成兩個，成為四個叢集。但其中的症狀描述內容，根本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唯一較大的變化是增加了解離亞型。

(stressor)，如此一來，PTSD的創傷認識框架便難以顧及創傷事件發生的文化、社會、歷史、政治脈絡(Young 1995)，亦忽視了主體對創傷事件的詮釋、施暴者與受暴者之間權力關係樣態等意識或無意識因素，如何影響創傷「症狀」的形構和展現(彭仁郁 2014b)。心理創傷的病理化對受害者提供了司法訴訟和社會福利上的肯認，但此種形式的肯認卻也同時造成心理創傷認識的標準化和扁平化。此外，主流精神醫學對於大腦神經生理因和基因病源學的偏重，也使得臨床實務上對於心理創傷的治療經常停留在醫藥層次，而最常使用的藥物是抗憂鬱劑和抗焦慮劑等主要使用於控制情緒心理疾病的藥物，在特別嚴重的情況裡，抗精神藥物也會出現在處方籤上。而這個過度仰賴精神藥物的傾向，與精神疾病診斷框架的選擇，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問題。

DSM所謂的「去理論化取向」在取消了病源學的追溯之後，過度倚賴外顯行為症狀操作標準的診斷框架選擇，是否真正能夠達到精神病理診斷效度的問題，亦引起來自精神醫學內部的批判和討論。¹⁷其中最常被指出的相關問題即是臨床上所謂的「共病」(co-morbidity)現象¹⁸，實際上可能反映了人為疾病分類難以捕捉真實精神病理狀態的窘境(Maj 2005; Kendell and Jablensky 2003)。在本文關切的主題方面，有重要文獻研究發現臨床上被診斷為PTSD的病患，經常同時被診斷為邊緣性人格、分裂型人格等人格疾患，而絕大部分的患者都曾在童年時期遭受嚴重的性侵害或肢體虐待(Yen et al. 2002)。另有臨床個案研究指出，過度著重精神症狀本身而導致對於病患童年期創傷史的忽略，造成原本應被診斷為PTSD的病人被誤診為邊緣性人格疾患或躁鬱症，以至於藥物治療不僅無法緩解病人的症狀，甚至讓病情惡化(Salzbrenner and Conaway 2009)。忽視創傷生命史追溯，在臨床實務上另一個

17 如2011年世界精神醫學期刊專號(*World Psychiatry*, 10[2])中多篇文章比較了DSM的操作型標準診斷模式(數算特定病人身上出現症狀特徵數量)和ICD(國際疾病診斷手冊)症狀描述原型(prototypes)診斷模式間的優劣。專號作者傾向認為DSM模式診斷的信校度是較弱的(Maj 2011)。

18 即同一個病人身上同時併發多種疾病的現象。比方說思覺失調症(舊稱為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能同時獲得情緒性疾病和人格疾患的診斷。

可能發生的問題是，倘若醫師未能詢問出，或病人在高度警覺與防衛狀態下無法訴說重大創傷事件（PTSD的第一診斷軸度），亦將增高誤診的機率。¹⁹

針對此忽視主體創傷史而引發的誤診現象，在心理創傷研究領域至今仍具有重要國際地位的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臨床精神醫學教授朱蒂斯·赫曼(Judith L. Herman)，早在1992年的經典著作《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即提出觀察與批評。赫曼教授和同事根據多年臨床工作累積的四十個父女亂倫性侵個案，於1981年共同出版了《父女亂倫》(*Father-Daughter Incest*)，可謂當代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取向亂倫創傷研究的先聲。

《創傷與復原》特別指出經歷長期童年創傷的病人往往容易被誤診為其他的精神疾病，尤其是那些未曾將自身童年時期經歷過的性侵暴力與現前心理受苦狀態做任何聯想的亂倫性侵受害者，她們可能獲得的疾病診斷包括重鬱症、躁鬱症、邊緣性人格疾患、多重人格疾患、反社會人格疾患，甚至是精神分裂等。在比較了戰爭、俘虜、性侵、家暴等不同型態的創傷之後，赫曼指出PTSD診斷標準症狀的描述，主要是參照越戰退伍軍人的症狀，忽視了長期家暴、童年期性侵等創傷症狀的特殊性，多與女性身受的暴力相關，其中包括嚴重失憶、強烈的不信任感、人格扭曲等，這些不見得外顯為情緒失調或焦慮的症狀。赫曼因而提出「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PTSD)的病名，以描繪長期、重複的人為暴力創傷情境所導致的特殊症狀表現、人格結構和情緒表達模式的變異。她主張，倘若DSM納入Complex PTSD或CPTSD的病名，將有助於做出更準確的鑑別診斷。可惜的是，這個觀點並未獲得以研究退伍軍人創傷為主的專家所組成的DSM-PTSD疾病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因而至今未正式納入DSM手冊。²⁰此外，赫曼也建立了創傷復原的三階段模式：安全感的重建、回憶與哀悼。這三個面向的確是創傷療癒過程中

19 本文主角蛤仔，可說是此種主流醫療框架處境下的受害者。

20 Roth et al. (1997)曾討論CPTSD（或簡稱CP）症狀特徵與PTSD的差異，認為1994年DSM僅把CP症狀放到附屬特徵描述是過於保守的做法，也無法令童年期長期性侵與肢體暴力引起的創傷症狀的特殊性獲得正視。

需處理的重要議題，然而，以階段模式的方式呈現極其迂迴複雜的療癒過程不免失之簡化，且仍不脫以個體為單位的心理療癒取向。為了爭取長期遭受家暴、性侵、心理操控的受害者的創傷受到正視，赫曼的努力實令人欽佩，但將創傷引發的特殊內在動力化約為標準化和病理化症狀描述，仍然可能讓臨床工作者與創傷主體失之交臂。

(二) 主流心理學經驗類別化的性侵創傷知識

儘管國內心理諮商、社工、犯罪心理學界不乏以性侵為主題的研究，但目前仍相當欠缺針對亂倫性侵主體經驗的基礎研究。相較於以暴力行為為矯治、創傷治療、處遇政策修訂為主要關切的心理或社工實務研究，真正探索亂倫暴力之主體經驗的學術著作顯得相當微薄（如陳慧女 2007；呂瓊華 2004）。相關理論探討大都僅止於英美國家心理創傷理論的文獻引介與援用，即使強調主體經驗的研究，仍傾向把亂倫創傷現象放在創傷事件對個體認知、情緒、行為、人際關係等不同心理層次的症狀式框架中來觀看，鮮能真正返回（或現象學意義上的還原）被心理專業概念框定前的主體經驗層次。

臺灣臨床實務歷程研究中對於亂倫性侵受害創傷經驗的觀察（張碧琴 1998；陳慧女、廖鳳池 2006；李開敏 2003；洪素珍 1996），確認了國外童年期性侵研究既有文獻中提到的受害者心理特徵與困境：如基本信任的破碎、人際與親密關係的障礙、身心症狀、自我價值感低落、反社會傾向（如說謊、暴力或犯罪等）、自我毀滅傾向等。²¹這些由長年性侵和心理虐待所導致的心理創傷的臨床特徵類別描述的重要性，在於可幫助指認模糊難辦的心理創傷現象，對於初入行的專業工作者尤其可達到指引的效果。但是從受害者自己書寫的自傳²²，和我長年接觸的亂倫性侵受害主體的經驗中可

21 Cf. Herman(2000)、Courtois(1996)、Haesevoets(1997)等家內性侵相關經典著作對家內性創傷特徵和治療歷程描述。

22 如Isabelle Aubry(2008)的《第一次，我六歲》(*La première fois, j'avais six ans*)，Mathilde Brasilier(2015)的《有白天、有黑夜、有亂倫》(*Il y avait le jour, il y avait la nuit, il y avait l'inceste*)，Linda Katherine Cutting(1998)的《記憶空白：鋼琴師的童年、音樂與傷痕》(*Memory Slips: A Memoir of Music and Healing*)。

觀察到，既存的理論知識框架與療癒部署，時常不足以應付這類創傷的複雜性。尤其是當受害者（如本文主角）表現出某些創傷人格特質或疑似精神症狀的行為反應時，轉介精神科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然而如上所述，主流精神醫學的精神病理觀點與醫療框架，卻往往承接不住這樣的主體。

歸納亂倫創傷的一般外顯症狀對於臨床工作者或重要他人初步了解創傷主體雖至關緊要，但這些從外部描述的症狀卻只是亂倫主體經驗中複雜多重的面向之一。再者，倘若考慮每個創傷主體的殊異性，實有必要在界定創傷經驗內涵之前懸置既有理論框架，透過個別主體經驗的深度探查，才可能呈顯亂倫暴力創傷經驗的複雜度。本文尋求對於亂倫創傷主體經驗的考察，即試圖懸置精神病理學框架及歸納涵括式的症狀或特徵描述，以了解亂倫家庭的日常生活主體身上留下哪些未曾言明的印記，而這些印記又如何可能決定著這些主體日後的自我和社會關係。

（三）精神分析與亂倫性侵創傷的遭逢

不僅是主流精神醫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實證觀點和治療技術可能在理解創傷主體經驗時產生侷限，古典精神分析對於創傷主體的關照亦難以跳脫單一個體或家庭單位的想像。本文期待從精神分析客體關係理論中超越主客關係的過渡現象概念(Winnicott 1989, 1990)出發，重新檢視心靈真實這個重要的精神分析概念，並以心靈地景概念作為具象化、但避免物化(reify)創傷心靈真實的可能思路。

在精神分析理論家當中，第一位真正針對童年期性侵和其他形式虐待的臨床觀察發展出較深刻的創傷概念思考的，要算是匈牙利精神分析學家桑多·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 1873-1933)。他在1932年不顧被他視為象徵父親的佛洛伊德的警告和反對，獨排眾議，出版了〈成人與兒童的語言混淆〉(Confusion of Tongues between Adults and the Child)，探討成人對兒童施加的長期性侵和虐待，如何因著兒童對成人的情感需求和實質依賴，造成兒童內在嚴重的衝突與撕裂——最嚴重者可能導致人格的多重碎裂。然而，由於精神分析內部對於內在心靈真實、尤其是無意識原初幻想的著重，以及對外在真實創傷直接或間接的貶抑，使得這篇文章要等到1980年

代之後，才成爲精神分析取向向童年期性創傷心理治療的經典。費倫齊在文中挑戰同時代精神分析師（包括佛洛伊德在內）愈來愈忽視真實創傷事件對個體心靈和人格造成嚴重影響的傾向。費倫齊在此爲童年期性侵創傷界定爲加害者成人使用成人用以表達親密情感的「熱情」(passion)，回應孩童對於「溫柔」(tenderness)的需求。雖然這樣的概念語彙極大程度掩蓋了性侵事件的暴力性質，但恰好提醒了我們，絕大多數的亂倫性侵行爲從外部看來並不具明顯的暴力形質，這也部分解釋了爲何對受害者來說，揭露事件和譴責加害者極其不易。

除此之外，費倫齊更提出了許多幫助理解此類創傷的概念，包括「對加害者的認同」（可以說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前身）、「創傷－裂解」(trauma-cleavage)對偶關係、「解離」（無意識防衛機制）、「情感上的拋棄」(emotional abandonment)、「自我的裂解」（重複創傷引發的人格粉碎）、「過渡性精神病(transient psychosis)」、受害兒童作爲「施虐父母的心理醫師」等(Ferenczi 1982)。這些概念細緻地討論情感關係的嚴重創傷如何影響兒童的心靈組構和人格發展。例如受害者如何爲了自身的倖存，藉著認同加害者進入其思想和行爲邏輯，因而不僅被剝除主體性，同時亦承接了理應屬於後者的罪惡感；此外，爲了保有與加害父母的情感連結，無意識自我防衛機制可能以解離或「負向幻覺」(negative hallucination)抹除受害場景的記憶，阻斷了指控的可能，亦喪失了自我感受的能力。值得順道一提的是，當代精神醫學、臨床心理學對於創傷相關精神症狀或人格異常（如多重人格）的概念，可以說很大程度延續了費倫齊的理論建樹(Frankel 1998)。

李奧納德·申戈爾德(Leonard Shengold)在1989年將亂倫暴力視爲對主體的「心靈謀殺」(soul murder)，可說是當代精神分析學界中最早注意到亂倫暴力最主體造成創傷嚴重性的研究者。但一直要到1980年代末期，在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家和臨床工作者的呼籲下，精神分析內部才開始反省佛洛伊德的內在驅力病源學轉向。柯洛德·巴里耶(Balier 1999)爲第一位透過重大性侵罪犯的分析治療工作，著手研究亂倫性暴力的精神分析學家。隨後，愈來愈多的精神分析師開始認爲，應將亂倫真實與無意識原初幻想(primal fantasy)做區分，省思精神分析應如何改變理論框架和分析技藝，以因應此

一真實創傷(Simon 1992; Welldon 2005)。部分當代女性精神分析學家，在與亂倫創傷主體的臨床遭逢中，認識到必須把真實亂倫事件置放到伊底帕斯慾望結構中，檢視伊底帕斯情結與亂倫性侵的交互衝擊，如何對伊底帕斯主體化歷程發生影響(e.g., Peng 2009; Alizade 2005; Parat 2004; Razon 1996)。

相較於將亂倫創傷置回伊底帕斯理論來思考的取向，尚－克勞德·哈坎米耶(Racamier 2010)則提出l'incestuel（暫譯為「類亂倫」）概念，以尋求理論框架的突破。但此概念主要以精神病患者與母親（或父親）彼此過度依賴的臨床觀察為基礎。哈坎米耶發現許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照顧者之間的情感關係仍停留在嬰兒期的部分客體關係，其情慾滿足模式接近前伊底帕斯的自體情慾(autoerotism)，他將此尚未進入伊底帕斯三元心理結構的主體前身命名為antœdipe（暫譯為「輔伊底帕斯」），而未能與客體分離，因此仍將客體視為自身一部分、不分他我的關係則被稱為「類亂倫」。此作者認為停滯在此種狀態的「伴侶」不見得伴隨實際的亂倫性行為，但相反地，所有的亂倫性行為皆以此無意識心理狀態為根源。然而，「類亂倫」概念雖然可用於解釋非暴力的亂倫關係，或施暴者一方的無意識心態，卻無法理解絕大部分非精神病患受害者這一方的亂倫創傷。

我在2009年出版的由博士論文改寫的法文專書À l'Épreuve de l'Inceste（《亂倫試煉》），是一個結合臨床心理療癒與田野參與觀察方法的創傷主體能動性研究。我以兩年時間分別在一個官方補助的受害者救助協會，和一個由亂倫受害者自行組成的民間團體中進行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並試圖在理論上修正古典佛洛伊德學派賦予伊底帕斯概念的意涵，進而提出「遭亂倫扼殺的伊底帕斯」(œdipe incestué)概念，以便將曾經被精神分析理論逐出的真實亂倫創傷，重新置回精神分析的理論思考架構中，如此才可能理解亂倫性侵創傷，除了來自性暴力本身造成的自我防護層和信任關係破裂之外，更重要的是伊底帕斯慾望結構的崩毀²³，導致主體化過程的阻滯。我認為，亂倫性侵受害者的主體欲望並非脫離伊底帕斯結構，反而因著無意識原初幻想侵入現實生活，令主體與父親和母親的

23 並非如許多佛洛伊德學派精神分析學者主張的，是無意識亂倫欲望的「實現」。

關係，陷入難以撼動的糾結。該書之所以強調亂倫性侵創傷的複雜度，意不在強化受害者／倖存者被動受害值得同理同情的面向（即使這點亦不應被忽略），而更在探尋倖存者如何可能透過集結帶出能動性的歷程（自組受害者協會、發動要求修改法令的遊行、籌辦亂倫問題社會意識的宣導活動等），讓亂倫創傷主體能以更貼近其內外真實的樣貌現身。本文的研究方向除了延伸此一主體經驗研究路徑，更希望能從臺灣亂倫性侵受創主體的經驗裡，爬梳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 Geertz 2000)。這樣的主體知識不同於建立隨即可用的模型式概念知識，而是離開全知主體預設位置（*Sujet supposé savoir*，即一個被預設能了解人所有的心理狀態的大他者），尋求在關係中陪同創傷主體進入言說位置的實踐知識(Roussillon 2001)。

四、臨床田野：位於精神分析與人類學交界的方法論

（一）心理創傷：介於外在真實與內在真實之間的研究現場

嘗試探究創傷主體經驗的田野現場，有別一般心理學設定的研究範疇（外顯行爲、情緒表現、認知模式）和尋求實證科學客觀性的知識論立場，以致在研究對象和方法的選擇上被侷限在容易外化或量化現象的觀察、描述與歸納。著重心理創傷的主體經驗面向，意味著我們在知識論和方法論上必然要走向以言說和表徵趨近無法再現的欲望、感官、感受的主體世界，卻又明知此努力終將是未竟之業。此立場乃基於心理創傷性質本身：「心理創傷的形成，不僅是由外在創傷事件的暴力性質及殘酷程度所決定，更取決於主體如何理解、詮釋創傷事件，如何將此創傷經驗嵌在自身生命背景中，成爲想像、實踐自身存在樣態與他者關係的基調」（彭仁郁 2012：153）。本文試圖捕捉的創傷主體經驗，乃是介於真實暴力心理衝擊、情感關係與主體欲望之間非線性交互作用的界域，易言之，即心靈真實的界域。

精神分析後設心理學很早便透過心理創傷臨床研究察覺外在真實（external reality，或物質真實material reality）與內在心靈真實之間的區隔和不對應關係(Janin 1995)。後者除了與身體感官相連的情感衝動、無意

識欲望，亦包括內在情感衝動、無意識防衛機制、主體互動經驗交互影響之下形構的內在心理表徵和意義（或無意義）。內在心靈真實影響著無意識自我形象的形塑，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樣貌(Chouvier and Roussillon 2004)。倘若我們僅從主體的外在社會身分標籤（把低收入戶、失能家庭、失業、孤立等視為危險因子），甚至是可見的外顯行爲（說謊、孤僻、人際焦慮……）、情緒表現（恐懼、憂鬱……）或認知模式（內／外控、負面自我概念……）來設想主體的困境，很可能發生誤解和誤判。

需強調的是，心靈真實並不等於幻想，而是主體欲望以想像為媒介展現的各種樣態；它並非與外在真實對立、脫鉤(Ricœur [1913-2005], 2008)。我們無法直接探知心靈真實，但我們能夠從無意識驅力的效果或製造物（夢、失言、症狀等）來窺見，亦即透過心靈裝置對於感官經驗痕跡的驅力投注，以隱喻（濃縮）和換喻（置換）的表徵作用(representation)²⁴輾轉呈現的心靈產物(Le Guen 1995)。然而，誠如Parat(2004)的分析，亂倫性侵暴力的後果之一包括原初幻想內容（亂倫誘惑）侵入外在真實領域，致使主體欲望、幻想和想像界域，與毀滅性威脅發生強烈鍵結，因而令創傷主體被重複的噩夢淹沒，或是以封鎖想像和可能撩起想像的情感鞏固理性自我的運作空間。在此情況下，該如何接近主體內在對其自身而言具有威脅性的心靈真實？溫尼考特(1989)針對兒童遊戲和過渡客體的精神分析臨床觀察而提出的「過渡現象」這個概念，是一個可以借鏡的思考起點。

溫尼考特是少數能夠超越主客體二元關係，將創造性和想像力引入的精神分析理論家和臨床工作者。他在《遊戲與真實》(*Playing and Reality*, 1989)等著作裡提出過渡現象與過渡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的概念，以探查幼兒脫離主觀內在世界、過渡到外在客觀世界的歷程。溫尼考特透過分析情境中兒童病人與自己傳移關係的細緻觀察，發現兒童富有創造力的積極想像的自由展現，是讓她／他能夠相對順利地與原初客體分離及形塑人格

24 在此保留心理學的翻譯慣例。因相較於文學領域較常用的譯詞「再現」著重於指涉文本或符號替現不在場存有的能力，「表徵」一詞則偏重表意主體生產符徵的動能。

airiti

的重要關鍵。兒童能夠成功地成長為一個相對健康的主體，取決於她／他是否能在「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²⁵的陪伴下被賦予自主權，進入一個介於純粹幻想與外在真實的中介區域(intermediate area)或潛在空間(potential space)，盡情想像、玩耍，任意對過渡客體施展正、負面情緒，意即練習摧毀和修補關係。「夠好的母親」有能力隨著嬰幼兒需求滿足和對照顧者不在場時間容忍度的變化，而逐步調整照顧韻律。一開始完全配合嬰兒的全能幻想，讓她／他產生對母親／世界有絕對掌控力的錯覺，作為依附安全感的來源；隨後，慢慢拉開需求滿足的時距，讓嬰兒逐步意識到母親和外在世界的客觀存在，並幫助她／他哀悼全能感的喪失。這個對於「夠好的母親」所扮演角色的理解，可以說為創傷主體的分析治療工作，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引。

在幼兒逐步接納世界客觀性的主體化過程中，照顧者的角色雖然關鍵，但並不擁有單一主導權。溫尼考特認為，當母親缺席時，在心理上未與母體分離的孩童，通常會主動地利用具有安撫功能，在某種性質上取代母親、但又不是母親的過渡客體（如柔軟又耐操的絨毛玩偶、小毛毯、小枕頭等），創造出一個可以提供安全感的中介空間。在此空間中，孩童會將原本針對母親但很難被自己接受的各種正負面情感，移轉到過渡客體身上，並在想像中演練著與原初客體（母親或照顧者）關係的分離（即承認原初客體是外在於「我」、脫離我掌控的獨立客體／主體）可能帶來的種種焦慮。因此，過渡空間提供了成長中主體演練與原初客體分離的想像空間，一方面確認了情感關係的穩固，另一方面逐漸在此穩固關係的基礎上學習獨立。而過渡客體作為幼兒第一個真正擁有的「非我」(not-me)客體，同時取代、又不等於缺席的母親，無疑是幼兒表徵能力的開端。換言之，幼兒與自己相處的能力和表徵能力與時俱進。²⁶

溫尼考特更認為過渡客體是孩童文化經驗的濫觴，在此經驗中，包含

25 在此「母親」泛指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並不一定是生母，亦不指涉特定性別。

26 關於母親缺席一現身交錯的頻率如何幫助嬰幼兒既能獲得安全依附又能逐漸獨立、接納外在客觀世界不受其掌控的過程，詳見Winnicott(1989, 1990, 2000)。

了文化傳統內容的傳承與主體想像創新兩個層面的交互辯證運動。這意味著過渡現象在成年人身上並不會真正消失，而是以各種隱而不顯的形式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延續。在兒童身上，過渡空間中「我」與「非我」關係所呈現的圖像和性質，可藉由孩童在遊戲中對待玩具或其他物件的方式所推知；而在成年人身上，則可從做夢、說夢、創作等想像活動和表徵內容窺見(Winnicott 1990)。

(二) 臨床田野作為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意涵的深化

綜合上述溫尼考特的理論，不管是兒童或成人的表徵活動皆涉及自我與他者的相對安全關係，心靈真實要能透過想像和表徵活動被具象化，必須以主體發展出使用客體（與客體發生關聯）的能力為前提。這意味著，在創傷主體經驗研究裡，倘若研究者想協助主體重建（或建立）因過度驚駭而凍結的想像和表徵能力，必須首先協助主體把自己當成關係客體來「使用」（可參見Khan 1997）。

我們如何可能接近介於外在真實與心靈真實之間的主體經驗現場？如果精神分析治療情境是少數允許貼近此中介空間的當代場域，在心理創傷的研究現場，當做為敘說前緣、創生表徵的主客體過渡空間，因重度創傷經驗而被封鎖、凍結，或充滿具威脅性的幻影時，如何建立安全的互為主體關係，開啓想像和言說的可能？為了不讓創傷主體的言說空間被縮限在治療場域，或被迫以控訴、見證等既定樣貌現身，我提出了「臨床田野」方法論，作為研究者貼近創傷主體經驗的可能路徑（彭仁郁 2014a）。

在早先的文章中，我初步將「臨床田野」概念界定為，文化人類學與精神分析學基於對主體性及異己性(otherness)的共同焦點，在心理創傷等研究領域的特殊要求下，以互補的方式，朝向彼此實踐位置雙向移動的嘗試。人類學與精神分析分別以異文化主體（文化的異己）及無意識欲望主體（自我的異己）作為研究對象，對這兩者而言，進入異己的田野，皆意味著懸置自身文化或意識自我內部已知邏輯、規則或形態的既有知識，重新從未知和「非知」出發，將自我浸泡在異己對自身彰顯的謎樣訊息中，並透過關係的建立，逐漸摸索、解讀外顯現象的深層意涵。

延續此跨學科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對話企圖，本文側重深度描繪創傷研究的臨床田野現場，更明確地以下列三個層次的研究行動闡述「臨床田野」的意涵：

1. 帶著精神分析訓練的耳朵和敏感度（聆聽能力），進入廣義的田野，與異己主體遭逢；
2. 在田野的（傳移）關係事件中，創造令主體發聲（enunciation，包含語言與非語言之言說）的情境；
3. 藉由對此發聲的詮釋，理解主體生命經驗，與主體共構關於嵌在（包含斷裂的）關係之中的主體的知識（打破單向詮釋的科學主義知識取徑）。

更寬廣的來看，臨床田野概念的提出是爲了以臺灣本土經驗研究，呼應歐陸和北美人類學及精神分析學界自1990年代起所重新點燃的跨學科對話，試圖回答此二學科的跨領域合作應以何種形式進行，或可在哪些研究議題上對話的提問(Bidou et al. 1999, 2005; Assoun and Zafiroopoulos 2002; Selim and Douville 2009; Drach 2009; Molino 2004; Heald and Deluz 1994)。

五、與蛤仔遭逢的臨床田野民族誌

深層的我是什麼樣子的？我不該看、也不敢看，因爲可以想見的是，那是一個受苦黑暗又破碎的靈魂。（2012年11月9日，第五次晤談後蛤仔的自我紀錄）

（一）「都是我的錯」無限循環方程式²⁷

且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與蛤仔第二次訪談的那個晚上。

27 蛤仔靠著自己的絕頂聰明和勤奮，透過上千本書籍、學術論文、網路論壇文章，自學了資訊網路工程、語言學、生物醫學動物實驗法、地理學等，在我們的談話當中，不同電腦運作系統環境和資訊方程式經常被彼此用來比喻她和我思考邏輯之間的差異。

第二次訪談距離第一次不到兩個星期。蛤仔被老闆派來北部出差，我們便約在我工作的地點談話。此時的我，以為蛤仔承受的家暴性侵已經是過去式，並不知道來北部對她意味著被父親「抓回家」的風險增高，並且恰是爲了這個原因，她選擇在S城工作生活。

在這次訪談過程中，她揭露了國中時期一次極爲痛苦的經驗。國二升國三的暑假，蛤仔母親帶著弟弟回南部老家，父親曾警告母親不可以這麼做，但爲了不復記憶的原因，母親甘冒觸怒父親的危險，帶著弟弟離開。²⁸自幼便經常代替弟弟或母親受罰的蛤仔，被父親關在不見天日的廁所裡，超過一個月的時間，²⁹父親並未按時提供飲食，蛤仔渴了便喝廁所裏的水。一度停水，她只好以馬桶儲水槽裡的水解渴。

就如同蛤仔莫名承受的其他無數次的處罰一樣，她從來不曾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麼引發父親勃然大怒，但是在父親一邊猛烈毆打一邊辱罵的恐怖氛圍裡，她最終全盤接受了父親／加害者的觀點：自己一定是犯了錯才會被處罰。只是細問下，所謂的「錯」，總是環繞著沾染性別與長幼階序傳統美德色彩的不合理要求，如「身爲姊姊，沒有把弟弟教好」、「沒有把家顧好」、「我不乖」、「我是個不負責任的姊姊」等。

類似的場景，是蛤仔童年和青少年期的家常便飯，久而久之，坐實了蛤仔對於自己的存在就是一個最大錯誤這個難以撼動的堅實信念。頻繁的無端被指責、百口莫辯的經驗累積³⁰，促使蛤仔發展出強烈的自責、甚至是自毀傾向，而外顯爲「反正我不重要」、「我是垃圾」、「我該死」之類的自殘式語句。這些源自受創經驗而具有殺傷力的句子，每每在她覺得自

28 據後來蛤仔的回憶，極可能是亦爲父親家暴受害者的母親爲了不明原因遭到嚴重毆打，隨後帶著她的弟弟離家出走近一個月。

29 這是蛤仔主觀的估算。由於這個廁所沒有窗戶，蛤仔沒有任何外在參照可供計算天數。再者，長時間挨餓的結果，她幾乎失去了飢餓和口渴的感覺。成年後的蛤仔發展出如廁恐懼症，迫使她嚴格限制進食和飲水的量，以盡量減少上廁所的頻率，造成她長期內分泌失調、停經。

30 一回，蛤仔對在大學心理系教授精神分析的研究者說「你知道習得無助嗎？」後者忍住沒有回應，好讓主體有機會主動使用這個心理學概念來指涉、表述內在深層的無助感受。

已被忽視的時刻出現，包括在與我談話的過程裡。³¹

在往後訪談中愈來愈清楚展現的是，只要蛤仔揭露亂倫性侵場景，即使並未真正觸及細節的描繪，她總要被莫名升起的罪惡感攫住。日後，當蛤仔對研究者的傳移愈來愈強烈而進入一種「治療性心理退行」(therapeutic regression, Kilborne 1998)狀態時，她自我鞭笞的自責語句更伴隨著無以復加的驚懼。每當遇到這種時刻，倘若我試圖把焦點轉向父親家暴和性侵行為的違法性質，蛤仔不再能像第一次見面時，以成年人的語氣明確地說出：「即使知道他們做錯，但因為是父母，也不能怎樣，就只能承擔吧。」她彷彿返回童年時期，以一種混合著童稚、卻又如重複播放程式的口吻，反覆為父親辯護：「爸爸不會做錯事」，「爸爸說不可以說謊」，「爸爸打我是為了我好」，「我做錯事，需要管教」。彷彿只要她認錯、努力做得更好，就可以讓一切停下來，讓父親不再生氣。

(二) 受創的思考邏輯：揭露＝背叛＝……專斷僵化的等式

被關在暗無天日的廁所的那段漫無止盡的時間裡，蛤仔唯一的期待是門被打開，會有光亮灑進來。門打開時，她張不開眼，只看到一個大黑影，有時給她食物、有時沒有食物、只有毆打、有時……說到這裡，她突然停下，露出受驚嚇的小動物般疑懼的眼神：

「我是不是說太多了？」「你沒有說太多，謝謝你告訴我這些，但是我可以想像經歷這些是非常可怕的，只是，好像說出來也同樣可怕？你是不是覺得不應該說出來？」她點頭。「或許你被規定不可以說？」她的頭更低了些。「你可能會覺得說出來破壞了你爸爸訂下的規則？」「我沒有爸爸！」她斬釘截鐵地反駁。

這個斬斷父親與她心目中渴望的「爸爸」之間存在任何連結的否定句，大概是目前的她對父親所能做的唯一抵抗了。³²

31 比方，訪談過程中我的手機震動、有人敲門、門窗外有嘈雜聲，或我因偶發事件稍微延誤，都可能啟動蛤仔的自我毀滅和關係毀滅衝動。當然，這些語句傷害的不僅是蛤仔自己，也包括任何試圖關心她、與她建立關係的人，這是當時無法想像他人可能被她的創傷波及的蛤仔難以體會的。

32 第二次訪談田野筆記。

2014年3月，當我知道蛤仔參與了三一八公民運動，並且在這之前曾多次參與不同型態的社會運動時，我一方面有跌破眼鏡的驚喜³³，一方面思考著：為什麼一個有能力挑戰國家機器、對抗社會不公義、投入為弱勢發聲的公民運動的主體，在面對自己父母的暴力時，卻完全被一堆自相矛盾的邏輯和規則綁住，只能全身放軟、咬著牙死撐、忍受全身被撕裂的痛苦，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對這個疑問，蛤仔的回答是，她看得見國家暴力施加於他者的不正當性（「因為很明顯有弱勢在受苦，需要幫助」），但是父母施加在她身上的暴力的暴力性質，則完全被一整套去脈絡的命令語句和僵化規則所掩蓋：「都是我的錯」、「父母不可能錯」、「只有家人會對我好」、「不是暴力、是管教」、「我不夠乖、不夠聽話」、「我沒有把弟弟帶好」、「我不重要」、「給了就會被看見³⁴」、「有感覺是錯的」、「沒有感覺就不會痛」、「不可以哭」、「哭不能解決事情」……這些命令和規則，完全符合父母對蛤仔的期待。只要她繼續遵守這些規則，她便可以期待有一天，當她完美達成父母的一切要求時，她就可能獲得父母的愛。然而，她無法使用或理解「愛」這個字，她被教導的字是「要」：「只要我做得夠好，他們就會要我」。³⁵

在理智層次，「不可能得到父母的愛／要」是蛤仔二十多年用痛苦換得的明白，但在無意識欲望層次，得不到意味著不夠努力，而努力意味著自我折磨、與自我感受的割離。在等式無限迴圈的短路效應下，自我折磨並隔絕痛苦感受的努力甚至與「得到」（享樂）緊密相連，形構了受虐創傷主體的自虐歡愉模式。

33 喜在發現她原來有能力在特定條件下與人發生連結。

34 「給」指的是把身體獻給父親用來發洩性慾。

35 我一開始便在蛤仔使用「要」這個詞彙時，感到一絲性意味，後來的會談中證實，「要」的確跟性有關，而父親在法律上對她的性侵犯，對她代表著「要」她。那是唯一她能從父親那裡感受到一丁點溫柔的時刻，回應了她對愛的渴望，也因此自認為「有錯、該死」的她，無法告發父親的性侵犯行為。

佛洛伊德從精神分析開創初期便強調思考皆以身體（包括感受）作為基礎。而威爾佛烈德·比昂(Wilfred Bion, 1897-1979)的涵容(containing/contained)理論更讓我們明白，孩童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感受，是因為照顧者懂得為孩子命名、詮釋知覺和感受，使原本無以名之的感官經驗（ β 元素）得以轉化為可陳述、因而可被理解的象徵語彙（ α 功能）(Bion 1984, 2007)。為了思考主體如何能意識到自身的感受、思想(thinking)自身的思想(thoughts)，以及這些內在歷程與外顯人格表現之間的關係，比昂修正了佛洛伊德關於記憶與潛抑的驅力經濟學模式，並結合克萊恩(Melanie Klein, 1882-1960)的客體關係理論，把尚未與表徵連結、紛雜而破碎的感官印記和情緒經驗痕跡稱為 β 元素。未能形成心靈表徵的幼兒，需要仰賴成人照顧者在「神遊」(reverie)的狀態下提供 α 功能（有如心靈裝置的「消化」功能），將幼兒藉由投射認同作用(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外射到照顧者宛如容器(container)的心靈空間中的 β 元素，轉化為可被夢或思想使用的 α 元素（即可能相互發生連結的感官或情緒心理表徵）。 α 元素的累積將形成「接觸屏障」(contact-barrier)，以區分意識與無意識內容，如此思考主體才可能進一步將之組構為可被賦予意義的畫面或敘事形式。³⁶

自小，蛤仔的創傷經驗和情緒感受，不僅因為受到父親的保密禁令而不能伸張，她試圖對極可能知情的母親揭露時，後者選擇站在父親那一邊，向所有女兒可能接觸的人們宣稱，他們的女兒因為精神疾病而胡言亂語，無中生有。³⁷

36 比昂的涵容理論，一開始是企圖以仿數學函數理論(theory of functions)的工具概念，來逼近造成精神病患者思考障礙的心靈運作模式。比昂提出 α function作為其中一種可能的理解模式。 α function原本應譯作 α 函數，但由於比昂又將母親或照顧者的心靈賦予將 β 元素轉化成 α 元素的涵容功能，亦即同時使用了function的函數與功能兩種意涵，故一般仍譯為 α 功能。由於篇幅及主旨的限制，此處無法深入討論比昂一整套關於思考、情感、情緒經驗與客體關係的複雜交互作用，期待未來有機會撰寫專文論之。

37 大二升大三那年暑假，當蛤仔被強制住院時，她父母也用同樣的說法（「女兒從小就有病」）說服了一開始原本相信蛤仔曾受到亂倫創傷的精神科醫師，入院時的PTSD診斷在出院時被取消，只剩下邊緣性人格疾患和精神分裂症。

（三）歇斯底里發作的雙面性：自我處罰+揭露創傷

第二次訪談結束前，蛤仔用祈使句要我把手交給她時，一種強烈的違和感讓我猶豫。一方面，嚴格說來我們還不認識彼此，蛤仔已經讓我知道她不信任人，畏於跟人接觸。我猶記得第一次見面道別時，我不自覺地輕觸了她的上臂一下，在那一瞬間，她幾乎驚愕得無法動彈；這一次，她卻要求我觸碰她的身體，所為何來？另一方面，在正統的精神分析訓練裡，觸碰分析者是大忌，雖然我不是她的治療師或分析師，在不清楚她對我是否產生傳移和情感投射之前，我接受或拒絕，其實都冒著未知的風險。猶豫了一陣子，她懸在半空中等待的手開始尷尬起來，我遲疑著半伸出的右手掌，被她拉向她胸前鎖骨下方的位置。

就在我的手觸碰到她的瞬間，某種身體記憶的按鈕似乎被啟動了，一幕幕的創傷場景身歷其境般在我面前揭開。剛才用理性冷靜的語言描述創傷事件經過的年輕女性，全然讓位給驚惶失措，顫抖著用盡全身力氣哀求施暴者原諒的孩子，嘴裡輪番反覆嘶喊著「我不敢了」、「不要了」、「好痛」、「都是我的錯」，夾雜著分辨不出意義的哀嚎，身體抽動的激烈程度，彷彿一條無形的鞭子，以極高的頻率，重重的落在她身上，又彷彿是一具看不見的龐大身體，正在撞擊她幼小的身軀。（2012年2月5日訪談田野日誌）

日後當我們回過頭討論那個晚上發生的經過，蛤仔解釋道，那天之所以用我的手碰觸她的胸口，是爲了練習不害怕我的觸碰，她認爲（或逼迫自己相信）我是安全的人，並「規定」自己不可以怕我。³⁸

已經根深蒂固的「揭露=背叛=錯=懲罰」的內在自動化等式，極可能是那天晚上促使她歇斯底里發作的原因。斷斷續續六個多小時的痙攣發作中，蛤仔時而跪地求饒，不停嘶喊著「我不敢了，我會聽話，會乖乖

38 後來我才逐漸得知，原來我是「安全的人」這件事，主要並非根據蛤仔對我的實際觀察，和跟我相處的感受所作出的判斷，而是一項她自己下的命令。後來，當蛤仔願意開始相信我之後，她逐漸坦誠，當初之所以會跟我聯絡，其實是希望透過參與研究訪談，間接尋求專業協助的「交換」。她必須用對自己下命令，也就是把來找我當成一個必須執行的任務，才可能稍微抵抗父親所下的「不可以信任陌生人」、「不可以把秘密說出來」的誡命。

的……」，時而顯出身體正承受著沉重的鞭笞或反覆撞擊。這個碰觸練習終究違反了她父親從小的教導：除了家人，外面的人都不可以相信，外人會害你，朋友會背叛你。這個挑戰父親的行動同時觸發了症狀，讓蛤仔自幼承受卻無法言說的暴力場景，藉由意識暫時缺席的身體，直接呈現在我眼前。³⁹

以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學的角度來看，蛤仔正在經歷一場創傷解離(dissociation)或創傷經驗引致的歇斯底里發作。⁴⁰這是相當典型的長期施虐所引起的創傷後解離狀態。創立「下意識」(subconscious)概念的法國心理學家暨神經科—精神科醫師皮耶·賈內(Pierre Janet [1859-1947], 2004)，首度將歇斯底里症與創傷記憶、失憶症，和創傷後解離現象相連，而發展出催眠治療，以獲取處於另一種意識狀態下的人格才擁有的資訊，主要治療目的是將不同意識層的記憶和人格整合起來。佛洛伊德同意賈內將歇斯底里症病源扣連至不同意識層之間記憶無法流通的推論，但他與賈內對於意識之下的結構和運作機制看法不盡相同。

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前期與布洛伊爾(Josef Breuer, 1842-1925)合著的《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中已指出，「往事縈繞不去」(reminiscence)即為歇斯底里症患者受苦的原因，而這樣的追憶之所以引發痛苦，包含兩個層面：其一、追憶的內容為造成個體痛苦感官經驗與負面情緒的創傷事件，無意識防衛機制為了避免追憶引發痛苦（包括對主體內外在秩序的衝擊），必須將它從意識層潛抑至無意識中，進而轉化成令人不解、找不出任何生理原因的身體症狀。⁴¹被潛抑的創傷記憶內容，唯有在症狀「發作」（進入類似睡夢的意識狀態或「解離」）的情況下，才可能被喚醒或現身。意即，歇斯底里症的症狀，同時隱藏和展演著創傷事件的無意識記

39 蛤仔自己把這樣的意識轉換稱為「消失」。當她從「消失」狀態醒轉後，對消失狀態說的話、做的事毫無記憶。

40 精神分析談的歇斯底里，跟一般日常語彙用來形容一個人情緒失控的激動吼叫無關，而是非生理原因引發的身體疼痛、僵直或麻痺反應，通常是在意識層次被遺忘的創傷經驗的再現。

41 蛤仔在試圖逃離父親掌控三年後，全身仍持續劇烈疼痛，後經數度就醫，已排除生理原因。

airiti

憶。其二、這樣的潛抑並非一勞永逸：被潛抑者勢必要不斷地復返、尋找出路。當創傷場景重複出現，以致潛抑無法發揮功能時，心靈裝置便進行更激烈的裂解（splitting或cleavage），以更徹底的隔絕創傷憶痕的意識化。

費倫齊(1982)將人格裂解和意識的解離(dissociation)，視為童年期經歷嚴重累積性創傷必然引起的特殊無意識防衛機制。解離讓自我進入一種無意識狀態，即在創傷事件發生的當下將自我逐出意識，以「我」的不在場作為保護自我的方式。費倫齊亦觀察到另一種他稱之為「負向幻覺」自我保護機制，在此，主體並未轉換意識狀態，而是直接將具有威脅性的感官知覺內容直接從意識中抹除，宛如舊時警察國家將新聞刊物中敏感字句抹除，或如今日極權國家以網路防火牆隔絕敏感資訊。如果幻覺指的是內在心靈真實投射至外在現實世界的結果，負向幻覺中心理驅力經濟投注的目的，則是在取消、遮蔽外在現實世界確實發生的事件，但由於無法徹底消除感官經驗的記憶痕跡，反而可能被主體自己或他人詮釋為幻想或妄想(Ferenczi 1933)。

然而，當嚴重創傷事件一再重複發生，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便逐漸模糊起來，無意識防衛機制也將失去捍衛的功能，反而可能在解離時重現創傷場景，出現貌似思覺失調的幻覺，但那其實是長期累積的創傷感官經驗片段，不斷地以感官爆炸性憶痕的形式重複侵入意識生活的結果，不應被視為思覺失調症狀(Alayarian 2011; Spiegel 1994)。

但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是，那天晚上蛤仔的解離和歇斯底里發作，似乎並非純粹因眼前行動（回憶、敘說創傷）與過去創傷場景之間的聯想效應而促發的現象，亦是一種（自我）懲罰機制的啟動。那天晚上，蛤仔第一次對他人揭露父親施虐的嚴重程度，即使遮蔽了許多細節，光是打破沈默便觸犯了父親對她下的保密禁令。深信自己「做錯事」、「背叛」了父親的蛤仔，逼迫自己一定要「付代價」。此外，由於接受別人的好、和父親以外的他人建立情感關係，也是為父親所不容的事，因此也是一種必須要付代價的「錯」。蛤仔以宛如鋼鐵般的意志，實行著「揭露＝背叛＝錯＝懲罰或付代價」的自動化等式。需待我們的談話進入第三年後，我才恍然

大悟，她口中的「付代價」⁴²，主要指的是把自己的身體獻給重要他人作為情緒發洩或是獲得性滿足的工具。⁴³

（四）送醫＝拋棄＝出賣

蛤仔的「發作」間歇地持續了整個晚上，我想，如果叫救護車送急診，她會被注射高劑量的鎮定劑，然後可能會重複她大二時的恐怖經驗⁴⁴，我選擇陪著她到天亮，讓極度欠缺睡眠的她，至少可以在症狀緩和的時刻，獲得一些睡眠。⁴⁵在相對平靜的時刻，半夢半醒間，好幾次，她握著我的手，喃喃說著：「你的手好溫暖，像媽媽的手。」（2012年2月5日訪談田野日誌）

按照研究訪談同意書裡的約定，我和蛤仔之間是訪員與受訪者的關係，而非治療關係，理論上不應混淆訪談情境與分析療癒情境。然而，在不確定現有醫療救助體系能夠按照個案殊異情況，提供適切療癒情境，加上蛤仔已明確告知早先就醫的二度創傷經驗的情況下，⁴⁶那個晚上，我決定自己充當她的臨時看護。

以後見之明來看，如果當時我打電話請救護車把蛤仔送醫，也就不會有後來關係的發展。長期亂倫性侵創傷對主體最嚴重的負面影響，是信任感和安全感破滅而引發的自我毀滅傾向，而此驅力的對象，同時是任何涉及信任的人際關係與創傷主體自己（此二向度實為一體兩面）。按照蛤仔

42 進入關係便要「付代價」的定見，在蛤仔的訪談中反覆出現，是她一直以來理解人際關係的重要關鍵詞之一。比方「『凡事都要付出代價』這句話是我用身體學到的」（2012年11月9日自我紀錄）。

43 蛤仔經常詢問我「要不要她」，問句的後面常接著「只要你要，我可以給你」。這裡面除了包含把自己視為滿足重要他人需求的工具性「物品」之外，由於重要他人（父親）的需求當中性需求占有重要位置，因而她想像的「付代價」或希望滿足我需求、讓我「開心」的方式，也包含了給性。而我的拒絕，和試圖跟她建立有別於她跟父親的情感關係的邀請，也經常被蛤仔理解為「不要她」，因而也曾是造成蛤仔痛苦的來源。這情形一直要到關係進入第四年才改善。

44 被束帶捆綁後強制就醫三個月，並接受令她痛苦的精神藥物治療和認知行為矯正。

45 蛤仔睡眠困擾已經持續多年，因為害怕一睡著就會有可怕的噩夢出現，她強迫自己維持清醒。但每當撐不下去，她便會失去意識或「消失」，時間可以從幾分鐘到好幾天不等。

46 此時我仍不清楚蛤仔大二強制就醫的細節，只從她簡短的描述（「那三個月，真的很可怕……」、「我從來沒有這麼瘋過」）裡，猜測若在她失去意識的情況下強迫她就醫，極可能使創傷惡化，並嚴重斷傷我們之間仍極脆弱的信任關係。

對於家庭以外的人的關係建立模式（或應稱之為毀壞關係的習慣），只要對方稍微顯露出任何一丁點不值得信賴的訊息，她便會迅速切斷關係。這個隨時準備被出賣和背叛的不信任狀態，已經出現在蛤仔第二次的訪談內容中：「你現在知道這麼多，你可以隨時把我賣掉。」她花了三年時間才終於說服自己可以信任我。

根據長時間的觀察，蛤仔其實是被迫在對關係的極度渴望，和破壞與他人關係以捍衛與父親／加害者的同盟之間，無止盡的擺盪著。這個來自亂倫創傷的關係岌岌可危性(relational precariousness)所導致的反覆不定傾向，讓蛤仔在主流精神醫學框架下被診斷為邊緣性人格，而擔憂被病人操控的醫護人員對受創主體的極度防備和不信任，反而證成了她原本的預設：背叛核心潛藏在任何情感關係中。⁴⁷

（五）欺騙，或移置的真相

緊接著第二次見面後的兩個月當中，蛤仔用了許多巧思，把我帶進了表面上一切在她掌控下，實際上卻刮著強風暴雨、地動山搖的內在心靈真實。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蛤仔完全失去音訊。直到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蛤仔的求救電話。

一開始，是幾乎三分鐘的沈默。

我直覺地問：「是蛤仔嗎？你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

她用極度防衛的聲音反問：「你……是誰？為……什……麼，我我我手手手機裡……會有有你有你你的號號碼啊？」她咬字十分吃力，似乎無法控制口腔肌肉和舌頭。

我開始回溯我們見面的經過。在我描述某個細節時，她彷彿回過神似地悠悠地說：「我連起來了！你是最後一塊拼圖……」

47 認知心理學家Jennifer J. Freyd(1996)提出「背叛創傷」(betrayal trauma)理論概念，以釐清童年期亂倫性侵受害者對於加害場景極易產生情感性失憶的潛在動機。Freyd針對記憶認知功能所提出創傷理論，雖然考慮了親情關係如何可能逼迫受害者潛抑嚴重違背家庭想像的創傷記憶（加害者對受害者親情關係需求的背叛），意即受害者必須抹除加害場景記憶來維繫家人關係，可惜的是，Freyd並未延伸討論遭到背叛的受害者，不僅需要潛抑記憶，正因為其所辛苦維繫的親情關係實質核心包裹著背叛的無意識憶痕，此背叛核心亦將被投射到日後主體嘗試建立的任何情感關係中。

(2012年2月18日田野日誌)

蛤仔以緩慢的速度告訴我，她又被「關」（強制住院）了，每天在監視下服藥，又因為通報系統被啓動，必須配合做筆錄。她表示主責社工和警察天天逼迫她說出或寫出從小到大被父親性侵和家暴的時、地和動作細節，令她非常煎熬，因為她不想「害」她的父親。聽著這個介於可能與不可能之間的情節，我選擇進入她的脈絡，不論這情節是真實或虛構。我表示有點擔心她的情況，希望跟她社工談談，但是她堅持不願意給我社工的聯繫方式。她說從來不讓她認識的任何兩個人發生聯繫，這是確保自己安全，不讓父親找到的安全守則之一：「只要兩個點連在一起，被找到的機率就會增加。」無計可施，我只能答應每天跟她講一小時的電話，讓她的焦慮和恐慌可以得到紓解。但是這一小時經常延伸到兩小時。極強烈的分離焦慮，讓蛤仔無論如何想盡辦法不讓我掛電話。

如此過了將近一個半月。期間，我提議可以到蛤仔住院所在探訪她，她答應了，要求我在約定時間到她指定的地點跟我會合。當時，我恰好每星期必須跑一趟南部，便在路上順道探訪她。我原本以為會在病房會客室見到蛤仔，但是她跟我約在醫院的大廳會面，我雖心存疑竇，決定不做任何質問，暫時接受她的解釋。

一回，蛤仔爲了拿法醫驗傷報告等資料給我，跟我約在她工作的地方見面⁴⁸。這是我第一次聽她談她的工作內容，察覺她過人的聰明才智和工作能力。她也讓我看她最後一次與家人出遊的合照，照片中的她笑得很燦爛。她看著照片喃喃自語：「爲什麼我還可以笑成這樣？」。過程中，她頗爲刻意地讓我看她手上的醫院身分識別環，我看見她的名字，但刻意忍住不細看上面的日期等細節。見面尾聲，她照前幾次一樣，希望測試她的身體不再害怕我。她再次要求我把手掌貼在同樣的位置，這一次語氣緩和輕鬆許多，我感覺到她身體的震顫，但是這次她沒有「消失」。如同翻越一個艱困的山頭，她開心地笑了。結束後，她送我去搭車，一路上，她瞻前

顧後，十分不安。蛤仔告訴我，因為她曾經在這條路上被父親「堵過」，所以必須保持警覺。道別後，我突然想起忘了告訴她一件事，一回頭，瞥見一個驚恐慌張的身影，如一頭誤入有猛獸出沒莽原的小獸。我邊喊蛤仔的名字，試著追上前去，她卻驚嚇得越跑越快，彷彿完全不認識我。

一個半月過去，當蛤仔告訴我，她必須回北部出庭，希望我把時間空下來陪伴她時，我終於耐不住性子，決定寫email給她的老闆。經過幾通電話，我輾轉聯絡上蛤仔的專責社工。社工跟我做了一些核對，說明曾經陪同蛤仔到警局做過一次筆錄，然而她無法說出性侵細節，並且在警察問案過程中發病而緊急送醫，但並未住院。隨後社工告訴我蛤仔原本住在中途之家，後因被發現說謊，與督導討論、評估之後，認為蛤仔的說詞反覆、言行不一，高度懷疑性侵家暴的真實性，因此要求蛤仔離開中途之家，就此結案。我把握通話的最後一點時間，試圖讓這位聽起來相當盡責的社工了解，「說謊」，是許多遭受長期性侵家暴的主體，嘗試在求救（＝背叛）和服從加害者命令的矛盾處境中，尋求關係的不得不手段。當社工聽說我去過蛤仔工作的高教機構，而且證實蛤仔如她所說在該機構擔任研究助理時，她顯得十分訝異。

蛤仔發現我跟她的老闆聯絡後，焦急地寫了一封極長簡訊向我致歉，表示願意接受我的任何處罰或付任何「代價」。我回覆道，我仍舊願意相信她，但請她仔細思考，決定對我坦誠以後再來找我。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我的無意識顯然並非平靜無波，我的憤怒和無奈轉換成嘲諷，脫口而出：「或許能夠瞞騙過一位研究者，也算是一種能力證明吧。」那時的蛤仔不能懂我的自我保護驅力需要藉著嘲諷宣洩壓抑許多的情緒，她僅接受到「生氣」的訊息；更正確地說，我的情緒表達被傳移到「父親生氣了」的慣常模式裡，因而啟動她必須無條件聽從（被放在父親位置上的）我的命令作為懲罰。儘管我從未對她發出任何命令，這一整套「惹父親生氣－聽話－乖乖被處罰－讓父親開心」的歷程，成為我和蛤仔未來四年的相處中，最常反覆撞上的牆，因為這是她從小到大最熟悉最習慣、也最令她安心的關係模式。正因為我從未下過任何命令，蛤仔經常痛苦於在我們的關係中無所適從。而每回談話中好的感受，都可能引發自我懲罰的需求。說

airiti

謊（做錯事），再藉由自我懲罰、付代價來補償對方（父親的替身），是蛤仔唯一能夠允許自己跟他人建立關係的曲折路徑。

一個月之後，我收到蛤仔一封用電腦打的A4四頁長信，信中逐一澄清哪些點是謊言，哪些點是真的。她清楚地解釋，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討愛」。但她既然騙了我就必須「付代價」，完全無視我對於「付代價」邏輯的無法苟同。蛤仔請求我給她補償的機會：「你開出的任何條件我都會努力做到。」我回答，當她願意鼓起勇氣告訴我真相並道歉時，我已經原諒她了，她不需要付任何代價，但是如果她願意，我們可以開始定期會談，讓我們繼續完成她當初來找我時想做的事：告訴我她的故事。當然，對蛤仔來說，我的提議不符合她對「代價」（必須與痛苦相連）的定義，不接受施虐－受虐的關係模式，也就等於不接受她。因此，走不出慣有工具性關係模式的她，日後將反覆地說：「我給你的，你都不要……」

（六）「說謊」：無法正當化關係需求的唯一出路

蛤仔對我的傳移，其實在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前就已經開始。蛤仔在我們開始會談幾個月後，向我坦誠她在決定寫email給我之前，已經花了許多時間在網上搜尋，仔細調查過我的背景。⁴⁹蛤仔仔細研讀網路資料所拼湊出的「我」的樣貌，判定這應該是個「安全的人」，並且有能力幫助她。底下是蛤仔日後對這番調查的說明。

蛤仔：仁郁，我不是隨便找上你的，你知道嗎？我那時候爲了確定你是安全的人，我去查過你過去所有的一切，但我還是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被信任……我猜你可能救我，我從到大學就一直在找方法，只是沒有人有方法，應該說沒有人了解，更不要說去解決這件事……

我：爲什麼你覺得我可以救你？

蛤仔：因爲你不是醫生……因爲你是第一個想用我的方式懂的人，我才努力讓你看見我所看見的。（2013年2月1日田野日誌）

然而，網路資訊堆積出的研究者樣貌，與眼前這個會開口說話、但仍

49 在我們見面之初，她的筆記型電腦裡有超過500MB從網路上抓下來的關於我的資料。

無法看穿念頭的真人之間，埋伏著不可知的深淵。許久之後，她痛苦的承認，即使她寫了一個程式，讓電腦每週自動更新在網路上出現的關於我的資料，放在一個專屬於我的檔案夾裡，她仍舊無法判定眼前的我究竟是誰？會怎麼看她？怎麼理解她說得出跟說不出的經驗，和連她自己都不願或無法承認其存在的感受？無法百分之百信任我，讓她十分焦慮。

即使繼續說未說完的故事，不符合蛤仔對「代價」的定義，2012年9月中旬，我們開始了每週一次的會談。蛤仔無法理解我為何明明知道她欺騙了我卻仍舊願意跟她見面。我把自己反思後的理理解告訴她：對一個長期承受嚴重迫害的人來說，「說謊」可能是唯一可以用曲折的方式說出真相的不得已選擇。底下是那一次會談後她自己的心得摘錄⁵⁰：

你說我就像烏賊一樣，會噴煙混淆別人，真的上面會疊假的，存在的事情又會跟別人說是我騙大家的，而這就是我保護自己的方法：因為只要說自己說謊，就可以顯出我的卑劣，大家就會丟下我而離去了，我不斷用著相同的模式來摧毀自己；但也因為渴望被看見被愛，所以沒有的事會無中生有，所以會把自己弄得很慘，外加很矛盾，矛盾到自己撞牆撞到死。

你說我的心中有個小女孩。想要向外界求救，但我又會基於想要保護他[父親]的關係，阻止她跟外界求救。到頭來，還是沒有求救。

你很怪，跟我以往所有認識的人都不一樣。當我用欺騙的方式狠狠地甩了你兩巴掌、讓你受傷、亦曾試過用力的推開你；而我也因此覺得我很糟糕、不配接受你的幫助，而試圖掐死我自己，但你卻願意繼續與我有連結，甚至說出「我原諒你了」這種話。我承認我無法理解、也不懂為什麼你選擇這麼做，但你讓我知道你沒有離開，也不只是單方向的說話（第n章計畫⁵¹），反而我和你、你和我能夠有今天的「對話」——我說的是對話，而不只是說話而已——在那麼久之後。⁵²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願意這樣做，我也不了解為什麼你會願意付這些代價，因為就我看來我完全不值得被這樣「好好對待」。

50 我後來才知道，每回見面結束後，蛤仔都會自己做會談紀錄。她會把她判斷可以讓我閱讀的段落，在她認為合適的時間點寄給我。

51 這個計劃是蛤仔用編碼式語彙書寫自己自幼遭受亂倫性侵的超寫實自傳小說。

52 此處透露蛤仔急欲改變的焦急引致的不對稱時間感，她承受父親的性暴力及肢體暴力超過20年，卻認為五個月的思考等待期是「那麼久」。

我是卑劣的小人，我騙你、傷你，但你卻選擇原諒。我渴望被饒恕，但我覺得我不配，而你卻願意給我這樣的機會，被原諒、去學習、被救贖。（2012年9月14日，蛤仔自己的會談紀錄）

（七）負向傳移：親近與痛苦同源

爲了不被心裡洶湧的懷疑和恐懼的退堂鼓打敗，爲了逼迫自己在跟我約定的時間赴約，蛤仔在那原已沉重糾結、自相矛盾，如千百條炙烈鐵鍊纏身的生存規則（如「錯了就要付代價」、「要付過路費才可以有關係」、「關係都是假的」、「要綁到痛，關係才存在」、「我沒有感覺，也沒有期待」、「朋友都會背叛」等）所鑄成的信仰體系上，再增添了專屬於我的數十道規則⁵³：「仁郁是安全的人」、「不可以麻煩她」、「答應就要出現」等。建立這些僵化規則的另一個目的，也爲了在可欲的關係中加上痛苦的捆綁，如此便可回到習慣的模式，並減緩內在面對父親的罪惡感。

雖然摻雜著跟我見面的期待，我們的固定會談對蛤仔來說是極爲「痛苦」的：這意味著她必須向一個家庭外的人洩露她父親的秘密或「家醜」，而她也正是這個「家」的一份子，在次級自戀內攝認同的作用下，如果這個家是必須被抨擊的，她自己也必須接受譴責。她想像我看待她的目光裡也包含著譴責。再者，她不認爲自己犯的錯可以輕易被原諒，因此，來見我，必須被她當成是懲罰自己的方式。這個自我懲罰傾向也展現了受害者「認同加害者」（Ferenczi 1982）的另一個面向：在傳移關係中，作爲研究者（求助對象）的我，被受害者置放在加害者的位置上。蛤仔一度承認，來見我、跟我談話的痛苦，幾乎跟她父親對她施暴的痛苦相當。但弔詭的是，也唯有持續這個痛苦，她才能接受自己跟我維持關係。即使她感受到我跟她的父親不同，但每一回來赴約之前因不確定感產生的無比焦慮，都讓她反覆地在來見我的渴望，和一刀兩斷讓恐懼停止之間，躊躇煎熬。

仁郁：

我想你應該不曉得，

我們的約對我來說是一種煎熬。

airiti

你給我希望，
但我卻不懂你的邏輯，
以至於，我撐得很辛苦。
現在的生活或許不會受到傷害，
但內心的拉扯卻比以前更甚更劇，
以前的苦是身體上的，
但因為有恨，讓我有力量可以往下走。
現在的痛苦是心裡和腦袋裡的拉扯，
因為我知道你沒有任何傷害我的意思，
所以我沒辦法恨你。
所以現在的我不能放棄，
我失去了放棄的選項，
而只能一直往下走，
但我卻不知道藏寶圖最後會走去哪裡？⁵⁴
又，那藏寶箱真的可以打開嗎？
比起黃金和寶石，
我比較可以想見的是污穢和黑暗，
若是有你，我可以嘗試開一點、看一下、躲一下，
但我，會害怕你會不會開多一些之後發現我是這樣的糟糕，
然後就丟下我跑走了？
而只留下我要獨自一人面對這滿目的瘡痕？⁵⁵

被嫌惡、被遺棄的焦慮在亂倫創傷主體身上十分常見，為了抵抗這樣的焦慮，她們經常避免進入任何情感關係；一旦進入情感關係，則容易出

54 藏寶圖，是我們前一次談話中使用的比喻。那次談話中她再次因為無法確定我「要不要她」，威脅著要斬斷跟我的關係。我把自已當時的感受「借給」她使用，把在我腦中浮現的情景告訴她：她來找我時放許多線索（包括「謊話」），要求我跟她一起探索她的過去，就像是對我慢慢揭開一張藏寶圖，邀請我一起探索這塊關於她自己的未知土地，當我們走到關鍵地點，她因為害怕，情急之下，便想縱身跳下斷崖，以為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困境。這個將自身反傳移情感象徵化的臨床技巧，接近比昂所描述的具有涵容轉化的 α 功能。

55 摘錄自2012年10月26日蛤仔寫給我的email。

現全權控制客體的衝動。無法抑遏地想要百分之百控制對方，其實目的是爲了控制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希望從他人眼中看見「好」的自己。⁵⁶然而弔詭的是，自我毀滅的衝動同時讓她們無法相信任何正面的評價是出自真心。就如沒有安全感的情人總要反覆質問對方「你愛我嗎？」蛤仔在等待我們見面的日子的時間裡，經常傳訊息問我：「你還要我嗎？」⁵⁷當蛤仔在家中被當成不同工具使用（性玩具、經濟來源、家事管理員、年老病人照顧者）的位子愈來愈清楚時，我也逐漸明白爲何單純、不具利益交換的關係，是超出她自身經驗所能理解的範圍。在關係中被毀掉的，只能在關係中才能修補。⁵⁸但結合了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信念的主流精神醫學典範，難以提供修補關係的療癒空間。

六、亂倫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

四年來，我跟蛤仔的關係經過多番波折、拉扯，前進、倒退、再前進，迂迴反覆。會談超過半年後，蛤仔從一開始見面長時段的沉默不語，只要試圖開口說與父母有關的事便會墮入退行性歇斯底里症發作，逐漸透過與我的傳移關係中發生的大小事件的回顧及關係修復的練習，學會運用隱晦的隱喻和換喻（包括用密碼般文字書寫記錄創傷真實的自傳小說），緩慢地展露她內在長久承受的身心創傷，尤其是父親長期性虐待和情感操控關係在她內裡刻下的心靈地景。

（一）逃不掉的「家」、無止盡的放逐

蛤仔第一次被性侵至少從四歲開始，國中期間最頻繁（頻繁到蛤仔已記不清細節），就連她離家就讀大學，性侵仍然在每一次假期回家時發

56 恰好是重複加害者權控關係模式、以確認自我形象的這一點，讓亂倫創傷倖存者容易被診斷爲邊緣性人格疾患。

57 我總是拒絕直接回答她的是非題，試圖澄清她問題底下的焦慮。這對當時的她而言，極難理解和忍受。

58 蛤仔在閱讀這篇文章初稿後告訴我，這是全篇她最喜歡的一句話。

生。四歲起父親就要求蛤仔跟他互相撫摸生殖器，用餵她喝奶作為藉口要求她口交，並吞下精液。她曾經詢問「為什麼ㄋㄟㄋㄟ的味道跟弟弟喝的不一樣？」只得到「因為你是女生」這個不明所以的答案。也曾因為偷喝弟弟奶瓶裡的牛奶而遭到毒打。蛤仔九歲開始，父親開始試圖插入，她喊痛，被父親喝止，並被告知「這會幫助你長大，長大以後就不會痛了」。然而，對蛤仔來說，指認性侵的暴力性質要比指認家暴來得困難許多，因為相較於父親毆打她的猛烈、恐怖和劇痛，性侵是她唯一能夠獲得父親一絲溫柔對待的時刻——只有那個時候，她覺得自己「被看見」。

進入正式會談第六次，蛤仔就對自己關於家的矛盾情結做出明晰的覺察，她的反思連結到自己的反核行動：「我認為停止、摧毀核電廠，才是救大家，我能夠說出這種話，是因為我知道這真的不好，這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建設。但我為什麼就無法接受摧毀我家？我想，是因為我在這當中是『既得利益者』，是因為我在當中有可以『被看見』的好處。」（2012年11月23日蛤仔的自我紀錄）因此，法律上和旁人定義的性侵行為，即使造成身體的不適和噁心感，即使剝奪了蛤仔的性自主權和主體性，卻弔詭地成為極少數賦予她存在感的經驗。然而，這個在童年時期被標示為「好」的「獎賞」，當蛤仔成為青少年、月經來潮之後，除了造成可能懷孕的恐慌之外，更增添了僭越母親位置的罪惡感。

蛤仔大學畢業後，在她高中失語症時期天天陪伴在她身邊的唯一的「同學」⁵⁹，鼓勵她逃離可怕的家。然而，父親棄而不捨地搜尋她，總有辦法透過不知情的大學同學，尋得她的住處和工作地點，迫使她換了三個工作，搬了三次家，也逼迫擔心為別人添麻煩的蛤仔，和所有曾經有過聯繫的人切斷關係。從各種跡象判斷，蛤仔父親應是雇了徵信社尋人。每隔一段時間，她會收到父親或其他家人的簡訊或email，警告她一切行蹤都在他們掌握之中，要求她儘速回家，否則後果自負云云。

59 在我們談話的前四年，蛤仔從來不用「朋友」這兩個字，對當時的她來說，「朋友」是背叛和出賣的代名詞。直到第四年末，她才開始表示自己正在「學習交朋友」。

於是有超過一年的時間，蛤仔不敢再租房，也不敢再找需要進辦公室的工作。只要有屋簷、有床的地方，便會讓她想起「家」。她開始過著居無定所，四處漂流的日子。在這段時間裡，她白天最常待的地點是人煙稀少的山中避難小屋，或幾乎沒有人會經過的公共廁所。晚上則趁著夜色保護下山，尋找可以攔截無線網路的處所，上網搜尋、下載工作所需的資料，然後再度尋找隱密的藏身處。

剛開始，她完全不肯讓我知道她隱匿的所在，她非常坦白地表示，雖然理智上知道我「對她好」、是「安全的人」，但仍舊不確定是否應該百分之百信任我。而信任，對她來說，非一即零，沒有中間值。另一個隱瞞的原因，其實是爲了保護：萬一她的父親找上我，既然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也就不需要幫她說謊，也不可能被「逼供」了。蛤仔直覺地選擇了這個地下組織常用的保密策略（組織網路中同級成員彼此不認識，也不知任務全貌），也說明了在加害者是父執輩的亂倫性侵家庭裡，受害者在父權高壓統治下的處境，宛如極權國家血腥鎮壓統治下的人民。

然而，即便設計了層層的防護措施，逃難中的蛤仔仍然沒有獲得任何安全感。

當蛤仔終於鼓起勇氣，逃離那個任父親種種暴力遂行的家，整整超過一年半之後，她仍舊不斷對我說：這世界「沒有安全的地方」。字字斬釘截鐵，不容辯駁，直視我的眼睛裡交疊著恐懼、絕望、憤怒、哀求。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了解這個不可動搖的結論的意涵：即使離開這個不是「家」的家，不意味著因此能夠獲得一個安全的休憩地——「家」通常引發的聯想。

她幾乎不吃不喝不睡，以避免任何生理需求。因爲上廁所和睡著，都可能因爲引發恐懼而導致她「消失」，最長可能延續幾天幾夜。即使當所有的外在客觀條件理應讓她可以安心休息時，她仍然不斷說著：「沒有安全的地方。」她的內在依舊烽火連綿，處處是險境，需要時時保持警覺。雖然我同意她的家人某種程度在跟蹤追捕她，但是似乎她自己也無法離開火線。（2013年12月31日田野日誌）

蛤仔花了蠻長的時間才敢讓我知道，她的家雖然可怕，卻是她必須不斷歸返的座標原點。離開這裡，便如同進入一個日夜不分的險惡場域，沒有安全可躲藏的內裏、也沒有外部可供逃離的無止盡放逐，一種自身被逐

airiti

出「我」的領地之外的永恆飄零。許多亂倫性侵受害者所說的「我不存在」，或「我不過是他（加害者）的延伸」，指稱的便是這樣一種自我被摧毀或未曾真正被允許長大成形的失根狀態。

此種自我被放逐在自身之外(exile du soi)，無立錐之地的內在困境，接近勞德瑞(Laub 2013)描繪的「內在放逐」狀態，以及茱莉亞·克莉斯蒂娃(Kristeva 1991)所談的「我們自身的異鄉人」(Étrangers à Nous-mêmes)。二者皆以跨文化、跨地域主體難以言說的飄零狀態，比喻自身之內無法被意識捕捉、或逃離自我掌握的異己性。在亂倫性侵創傷主體的放逐狀態裡，不僅因為「我」無法掌控存於自身之內詭譎的異己性而充滿焦慮，更因為「我」不能安居自身的內在心靈空間，維繫基本的安全感，以承接、探問、涵容這樣的異己性，以至於自身內充滿威脅的異己不斷將「我」逐出，令其遁向無止盡的潰逃。正是為此故，每當這樣的主體意識到與他人的差異時，差異經常被等同於猛烈的攻擊，彷彿就要天崩地裂。

(二) 傳移關係中揭開的心靈地景

在這段艱辛的逃難歲月中，疲憊不堪、「好想回家」但又不敢啓齒的她，好幾次在我們的談話中用幾乎發怒的語氣說：「既然遲早都會被找到，與其這樣沒日沒夜地逃亡，永遠活在恐懼中，還不如自己回去，反而可以休息。」這道怒氣指向自己，也指向我。當時的蛤仔無法在心理上把自己放在父親的對立面，我於是被她當成替身，被擺放在代替她跟父親對抗的位置，變成了那個「害」她沒有辦法回家的人。

每當蛤仔成功離家、試圖用拐彎抹角的方式對身邊的人發出求救訊號時，擅長社交的父親便會查她的通聯紀錄，傳簡訊給所有跟她聯繫過的人，以女兒患有精神疾病導致習慣性捏造說謊為由，進行一連串的「消毒」作業。⁶⁰每當有人因為不清楚詳情，希望蛤仔進一步說明時，便會引

60 我曾接到多封騷擾簡訊。口吻從軟性的親情訴求（請大家協尋失蹤女兒）、利誘（以頗高金額交換女兒行蹤情報），到責備（指責我不負責任，任其女兒在外流浪）。

發她將這些質問過度詮釋成他人對亂倫性侵真實性的質疑，而引爆她全面毀滅人際關係的衝動，並再次說服自己回家才是唯一的解決之道。一直以來，我沒有按照她的預期進入這個自我毀滅式的情感滿足迴圈循環，然而這亦引發另一種憤怒的指控：

彭仁郁！你知不知道？你在我生命中出現就是一個大災難！我原本已經想重新回去適應那種生活⁶¹，反正都已經撐那麼久……但是你的出現，全部都破壞了！你來我生命中一直在搞破壞！（2012年3月3日田野日誌，記於蛤仔求救電話之後）

在我們談話超過一年後，即使蛤仔意識到在情感上對我的依賴，仍然無法降低對我的陌生感。實際上，這種關係的矛盾或模稜性格，在一開始就嵌在蛤仔和她最親密的父母親的關係裡：最親密的人一方面帶來情感上的救贖（當她覺得自己有能力滿足父親的需求時，她覺得自己被看見、被需要），另一方面卻也同時帶來隨時隨地可能被至親背叛的絕望。而我，雖然不是親人，一旦進入蛤仔人煙罕至的內在空間，立刻便啟動了在信任和背叛兩極間激烈擺盪的情感依附模式。找到一個可能了解她的人的渴望，讓蛤仔不辭勞苦、跋山涉水來跟我見面⁶²，但是被背叛的恐懼，仍然讓她無法在會談的當下，說出她內裡正在發生的創傷真實場景。底下是蛤仔在我們第八次會談後寫下的自我紀錄，直到近半年後她才敢寄給我讀：

我怎麼能夠告訴你現在的我能夠看到、也能夠聽到——就像3D的影片投射一樣，就在現在、就在這個地方，此時此刻

重演？更無法說出口的是，如果我是以第三者的角度在「看電影」那就算了，瘋狂的是，我是主角。

我此時此刻活在電影裡面，有畫面有聲音有感覺。

但就算我沒說，你依然猜到了。你猜到了我在抵抗著「什麼」，只是你不確定，所以你在套我的話，就算你說出了很多的事實，但我是不會承認的，只因為我怕，我不能夠讓你有證據，然後把我送進療養院裡。（2012年12月28日蛤仔的自我紀錄）⁶³

61 指乖乖聽父親的話回家，繼續忍受暴力性侵。

62 蛤仔因為擔心被抓回家，不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而選擇用步行的方式移動，因而往往為了跟我見上一面，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63 蛤仔第一次間接承認自己有「幻聽」。在她跟我談話的同時，父親的斥責聲便

有時候，對她來說我是全世界唯一懂她的人，另一些時候，我又變得完全不懂到令她傷心欲絕。有時候，爲了讓我懂，她會不自覺地把我逼進她自己所處的既被捆綁又遭放逐的險惡心靈地景，好「幫助」我看見、甚至親身體認她的苦痛。比如，當她陷入痛苦自責的無限迴圈時，時或伴隨著毆打自己的行爲，無論我如何勸阻都無效。有幾回，蛤仔激烈的情緒引發我身體內隱隱出現被電擊的感覺，彷彿越獄犯人被通電的鐵絲網擊潰。當我把這個「心眼」看見的內在場景告訴蛤仔，她絕望地吼叫：「我又沒有要你進來！反正你也不想進來！你不喜歡！」連續三個否定句，如同佛洛伊德提出的負否定作用(verneinung)，恰好透露了她熱切地渴望我對她無法表達的感受感同身受，並進入她無法描繪的內在困境裡陪伴她。

底下以另一次晤談出現的隱喻場景爲例：

蛤仔再次陷入彷彿是我逼她不能回家、逼著她在她家人和我之間選邊的無限循環絕境中，她開始用冷峻的眼神看我，咬牙切齒地駁斥我說：「沒有安全的地方」。我的腦中開始浮現一個畫面，我把畫面告訴她：「你好像是一隻受傷無助的小動物，生在一個有兇狠野獸的山谷裡，野獸告訴你，牠們是你的父母親，但是動不動就咬你、攻擊你，還要求你被攻擊了不准哭、不准叫，更不准逃走。你好像知道牠們不是真的父母，因爲你不斷提醒我你只有父母，沒有爸爸媽媽，這個可怕的山谷也不是你想像中期待的家，但是你好像沒有辦法離開，爲什麼？」

蛤仔，打破許久的沉默：「因爲我對這個山谷的每個角落都很熟悉，雖然有野獸，我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會在哪裡出現，也知道牠們憤怒的時候，只要把自己丟給牠們吃，牠們滿足了就會安靜下來，如果離開這裡，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別的地方野獸比較少，但是我怎麼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沒辦法預測牠們在哪裡出現，這是更可怕的！而且，我怎麼知道表面上看起來像人的人，會不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變成野獸？」

我：「包括我在內嗎？你不確定我會不會突然變成野獸？」

她，在長久的沉默後：「……對，包括你在內……對不起……」

我：「沒有關係，我知道我不是，但是你還不知道，你會需要時間，很多時間，才能夠慢慢知道這件事。」（2015年4月29日田野日誌）

爲了避免直指創傷真實對蛤仔造成的焦慮，在四年的談話中，我們各自提出好幾個地景的隱喻，然後彼此添加細節，或修正對方描繪出的想像地景。除了上述的野獸山谷，還有牆上佈滿鐵絲網、通電的監獄，希望引人探訪但中途被燒掉的藏寶圖，潛入從未有人到過的深海，漂浮在海面上任浪花拍打不定的葉子，困在旋轉籠裡、拼命努力往前跑卻哪裡都去不了的松鼠，被鐵絲網纏住只能無力等待被空中老鷹撲殺的雞，被烈火燃燒殆盡的森林、她背著父親從不見底的井的深處往上攀爬、希望我一次把他們倆人一起拉（救）上來等等。

關於森林的隱喻，原本出自蛤仔認識我以前，和同學A的交談內容。A用森林大火比喻創傷經驗，告訴蛤仔，經過大火焚燒的森林雖然表面看似死寂，但有些種子韌性極強，能夠撐過浩劫，待春雨過後，便有機會展露生機。最初，蛤仔不斷地用「種子都死光了」的徹底否定，銷毀這個比喻的有效性。直到我們談話進入第二年，總是強調自己「沒有感覺、沒有期待」的蛤仔告訴我，這座表面上看似死寂的森林的灰燼深處，開始有綠芽冒出來。

談話進入第四年後，蛤仔透過書寫與自己展開想像的對談，終於把內心深處一直不敢吐露的想法讓自己聽見，也間接地「寫」給我聽：

—我想回家……

～回家不是會痛？怎麼還想回家？有什麼好處……？

—因爲知道被要。然後仁郁不要我，也不要換……我不知道她要什麼？

～所以回家會覺得被要？

—對。

～就算很痛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因爲本來就需要「換」。

～可是這些不是仁郁本來就知道的？是不是還有什麼沒有說出口的？說不出來及在害怕什麼？

—怕仁郁覺得我很糟糕＋噁心＋髒。然後擔心如果我說出來仁郁就不要我了……

～那如果不擔心這些，你想說些什麼？……不要擔心，你可以試著說說看？慢慢說也沒有關係，反正仁郁不在嘛！

—我想回家，是因為我想被要，應該說，那個強度不是只有「想」，是我很「渴望」，我想「討」……想起來很像吸毒，你知道這樣不好，就是想要。我的情況像是這樣，然後你會渴望被要，渴望被插，因為痛，所以你會確定自己在，而不是自己亂想，然後因為有體溫，所以你會知道你被摸，被抱，雖然黏黏的很噁心，但至少我被要……⁶⁴

能夠透過跟自我對談承認內在指認為污穢的身心渴望，說明蛤仔對我的信任，和對自己深層欲望的認識，在經過三年多的「搏鬥」後，終於有了大幅進展。後來，蛤仔的心裡又發生了好幾場森林大火，但到最後，仍舊有頑抗的種子和幼苗挺了下來。

（三）「心靈地景」概念對精神分析創傷理論的補充

精神分析研究提供了不少與主客體關係結合的創傷理論概念。從古典精神分析到客體關係理論，對主體在伊底帕斯三元結構中與父母雙方的愛恨糾結，有淋漓盡致的解析。但是此種以內攝、投射的想像動作（此乃心理表徵的身體基礎），把被裂解為好vs. 壞、愛vs. 恨二元對立的裂解客體，吸納進心靈裝置內、或自內裡向外排除，來設想主體與周遭世界原初關係的理論框架(Klein 1984)，雖然非常適於理解語言前或尚未進入象徵界的前主體與身邊親密他人主要建立在身體經驗上的情感關係歷程，但對於正在進入象徵界的準主體而言，如何感知、理解、命名、詮釋她與重要他人在親密空間（通常被稱為「家」）共處的身體感官經驗、被對待的方式？原初關係經驗如何影響她設想家以外的空間及其中的人們？遭到剝奪、斷傷的準主體如何從家以外的空間與關係中汲取養分和力量？如何突破原生家庭僵化關係模態的限制，重新組構內在心靈真實？並且允許原本陌生的關係樣態進入內在，令心靈地景打開、鋪展不同景致的可能性？這一連串重要問題，精神分析既有理論概念的著墨相對有限。

對於童年早期即遭到亂倫創傷衝擊的主體而言，過渡空間原本應有

64 轉騰自2015年4月19日蛤仔寫給我的email裡所附之筆記圖像檔。

airiti

的安撫和支持功能，因為欠缺外在真實環境的支持而難以運作(Winnicott 2000)。與原初客體的分離焦慮，經常以隱匿的方式保存下來（主體經常宣稱不需要任何人），也因此而使得主客體的分離難以真正實現。精神分析意義上的分離（或獨立能力），是在主客體關係確認的前提下發生，但在亂倫暴力創傷經驗裡，主客體之間是否存在真正的關係永遠曖昧難辨，主體在性暴力中自身被當成使用物的經驗，令她不斷在原初客體眼中尋找的自我存在，經常只能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出現。這種無法將自己視為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困難，部分說明了為什麼一般簡單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實踐，在這些經歷長期亂倫性侵的主體身上成為極度困難的事。

更重要的是，對於像蛤仔這樣經歷長期亂倫性侵的主體來說，過渡空間不僅沒有安撫的功能，也沒有能夠承受她強烈愛恨等正負情緒的過渡客體。這個介於真實與想像之間的心靈地景，要不就一片死寂，空無一物，要不就環伺攻擊迫害的非我之物（如上述野獸山谷）。因此，蛤仔只要一睡著，便重新墮入暴力性侵的恐怖場景，這讓她硬撐著沉重的眼皮埋頭工作，不敢入眠。歇斯底里式的解離成為最接近睡眠的狀態。

再者，內在心靈地景透過投射，影響主體對外在真實空間的感知。蛤仔非常害怕到人潮多的地方，分分秒秒無意識地左右張望，唯恐不知名的野獸隨時會伸出利爪攫取她這頭獵物。當我或其他關心她狀況的人，跟她談起亂倫性侵，希望她明白錯的人不是她，父親辱罵的聲音便會高分貝地霸佔她的聽覺，干擾我們的談話，甚至讓她的意識狀態重新回到被性侵當下的幽閉時空中。睡眠障礙、廣場恐懼症、幻聽、社交恐懼、人際關係在疏離和黏膩兩極間擺盪等，是蛤仔內在亂倫創傷心靈地景的外顯症狀，但這片地景很容易就被思覺失調、邊緣性人格疾患等精神疾病標籤所遮掩。

溫尼考特的客體關係理論教導我們，孩童需要一個夠好的、有能力涵容、護持的他者，才可能發展出相對獨立的自處能力。蛤仔的經驗卻教導我，「我」倘若有能力在世間行走，創造一個讓人有安全感的家，並有能力接觸他人，這個「我」必須首先被賦予對其內在心靈領地的擁有權。否則，被剝奪這個擁有權的「我」，將被逐出這片領地，進入沒有任何歸

屬可能的內在放逐。心靈地景概念，藉由創傷主體和研究者在傳移關係（也是療癒不可或缺的關係）中共同生產的隱喻，能深入貼近隱藏在創傷主體內在深處的幽微時空，藉由攝入相對安全的外在客體，活化內在死亡或迫害客體的樣貌，讓主體的想像和表徵創造力能夠重新在過渡空間中安全馳騁，才可能修復自身內在可歇息的居所，停止放逐。

七、結論：心靈地景的臨床田野

本文嘗試透過亂倫創傷主體的經驗研究，深化企圖結合精神分析與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臨床田野方法論，探索這兩個學科朝向彼此移動的可能和限制。對於把理論建構和臨床實踐視為一體兩面的精神分析來說，臨床必然是精神分析學家的田野。然而，本文呈現的個案研究經驗，恰好迫使我們必須重新界定心理創傷的「臨床」。倘若我遵循古典精神分析僅在診療室內進行「田野」的傳統，那麼蛤仔便不可能與我進入關係，進入將她的受創經驗意識化的表徵運動。與蛤仔和其他承受人為極限暴力創傷主體的遭逢，讓我看見走出臨床診療室牆外，接近主體不同生活層面，看見其內、外在真實的必要。在這方面，人類學田野工作訓練能夠修正精神分析研究過度偏重內在心靈真實而忽視外在真實的傾向。

反之，在一般人類學田野工作裡，研究者經常預設訪談只在意識層次發生，而難以處理田野中的情緒、傳移關係、創傷等議題。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田野工作者，才可能有能力承接受訪創傷主體的情感狀態，並在傳移關係中透過雙方共構的隱喻，彰顯主體內在的心靈真實。再者，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研究對於傳移關係的熟稔，使得她／他在面對主體將其預設為全知他者，進而請求研究者一同承擔創傷過往的幽靈暗影時，不但不會被研究者視為「麻煩」而想逃之夭夭，相反地，傳移的出現反而是令研究者有機會透過分析詮釋來理解主體的重要時刻。缺乏對於主體欲望及深層糾結衝突的理解，療癒或臨床田野研究都不可能發生。

本文提出的「心靈地景」概念，乃出自研究者進入臨床田野與創傷主

體交手的親身經驗，和對紛陳的經驗素材盡可能誠實的反思，希望能協助創傷主體自己、周遭關心者、廣義的臨床工作者，窺見亂倫心理創傷的樣貌。創傷心靈地景概念彰顯了主體關係模式與各種「症狀」顯現的深層動力，也再度確認了精神分析臨床田野中隱喻的使用對於「看見」創傷心靈真實的重要性。事實上，精神分析療癒的主要工具——自由聯想和傳移詮釋，也都不脫隱喻的使用。在臨床實踐上，心靈地景概念當有助於被情緒淹沒而無法自我觀照的主體，窺見她／他在自身內、外邊界漂泊的處境，那是尚待關係中的言說逐步修補的疆域。

跟蛤仔四年的相處，從劇烈的拉扯，到可以相對平靜的對話，這一路上，她費盡苦心邀請我陪伴她一同行走，幫助我看見亂倫創傷的內在景象，更讓我深刻地體認到，目前主流精神醫學或臨床心理學的實證概念工具，以及認知行為矯治的心理治療框架，在過度專注於指認外顯症狀的同時，形成了「文化盲點」(cultural blind spot, Laub 2013)，遮蔽了主體置身的心靈地景，使得創傷主體掙扎著發出的微顫話語，一次次地被消音。本文期待臨床田野概念的深化，不僅能夠推動心理臨床工作者將臨床視為田野，也能透過人類學田野中臨床面向的彰顯，開闢新的主體知識研究取徑。

* * *

〔後記〕：關係的機會卡

在我跟蛤仔進入第三年的談話以後，我們的關係性質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一年，她爲了能夠比較規律地跟我會談，相當程度上勉強克服了被父親找到的恐懼，決定北上尋找住處和工作機會。她仍然如生活在極權國家、長期被監視、冒著生命危險進行抗爭的社運份子，不敢連續幾個晚上待在同一個地方。但是她已經可以待在室內，甚至可以忍受跟工作夥伴共處一室。

2015年2月初，在一次遠行之前，她來看我，跟我道別。臨行前，她告訴我：「你知道嗎？我們認識已經超過三年了，居然還沒斷，這應該算破紀錄了！然後我想，應該是不會想跟你斷了，不過爲了以防萬一，我還

airiti

是給你這個。」她拿出一張卡片，邊遞給我邊說，「這是一個機會卡的概念」。卡片上寫著：

Hi XX：滿3年了，覺得有點神奇，就是我竟然還沒有跟你絕交！雖然未來絕交的機會不大，但想說還是先提醒你，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想不開的話，想請你反過來提醒我：「我是不想跟你絕交的！一定是哪裡短路了！！……很感謝你的怪和堅持，希望未來我們可以一直走下去！然後就像你說的。一起加油！」⁶⁵

這張卡片的正面是蛤仔在海灘上，精神奕奕地舉著獨木舟的槳，嘴角燦爛上揚，準備出發的照片。爲了說明這張照片的原由，她在正文下寫了一個長註：

本照片攝於xxx，划獨木舟最危險的兩個時段是出海和上岸⁶⁶，我想，現在已經出海了，只要我不自己跳海，溺斃的可能性不大……在外海，划累的時候是可以休息的，划不動的時候，則是可以把獨木舟串在一起，讓別人拖著走。但是不能夠太久，要不划的那個人會很累。划獨木舟的重點不在於划獨木舟（雖然這也很重要），真正的重點在於看風景。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悠閒地看風景。（2015年2月9日蛤仔給我的明信片）

這是蛤仔對於我們一起步上的創傷療癒旅程的寫照和期許，也是她在彼時彼刻對自身處境和我兩關係的暫時理解。

〔 後後記 〕：

在完成這篇論文初稿，投稿之前，我請蛤仔閱讀，並核對是否符合她的感受和經驗。在仔細讀過這篇文章，提出幾個時間點細節上的錯誤以後，蛤仔對我說：「從來沒有人能夠把我這些年來模模糊糊感受的東西說得那麼清楚，有種感覺，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大概是感動吧。」過了一會，她補充：「你寫得很好，但你結束在這裡，別人會誤以爲我好了，但是我還沒有好。」的確，這裡描述的好轉與透露的希望，只是創傷復原漫

65 用來強調的底線是蛤仔自己加的。一回蛤仔寫email給我時，告訴我她正在爲一位老師撰寫科技部研究計劃申請書，我當時亦在趕寫申請計劃書中，於是在回信末尾寫上「一起加油！」之祝語。

66 應該是參照我之前跟她提過的在海裡游泳的比喻。

長路程中的暫時樣態。亂倫創傷真實而龐大的復返力量，仍舊持續考驗著蛤仔和與她同處在關係中的我。後來她的情況又發生了幾次大轉變，但因為篇幅限制和研究主題焦點的選擇而無法納入，尚待未來其他論文進行後續討論。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Cutting, Linda Katherine (琳達·卡汀) 著，廖月娟譯(Liao, Yue-juan tran.)。1998(1998)。《記憶空白：鋼琴師的童年、音樂與傷痕》*Jiyi kongbai: gangqinshi de tongnian, yinyue yu shanghen* [*Memory Slips: A Memoir of Music and Healing*]。臺北(Taipei)：胡桃木(Hutaomu)。
- 呂瓊華(Lu, Chiung-hua)。2004。《童年亂倫受害者的生命歷程探討》*Tongnian luanlun shouhaizhe de shengming licheng tantao* [*The Research on Childhood Incestuous Victim's Life*]。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Guoli jiayi daxue jiating jiaoyu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MA.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Family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李開敏(Lee, Kai-min)。2003。〈受害兒少的創傷與輔導〉“Shouhai ershao de chuangshang yu fudao” [Abused Children's Trauma and Counseling]。《月旦法學》*Yuedan faxue* [*The Taiwan Law Review*] 96: 54-74。
- 洪素珍(Hung, Su-chen)。1996。〈性受虐者諮商歷程初探〉“Xinshounuezhe zishang licheng chutan” [Trial Exploration on the Counseling Process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es]。《中華心理衛生學刊》*Zhonghua xinli weisheng xuekan* [*Archive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9 (1): 67-92。
- 張碧琴(Chang, Pi-chin)。1998。〈真實與謊言：對亂倫生還者二度創傷工作之歷程〉“Zhenshi yu huangyan: dui luanlun shenghuanzhe erdu chuangshang gongzuo zhi licheng” [The Process of Working with Incest Survivors with Secondary Trauma]。《中華心理衛生學刊》*Zhonghua xinli weisheng xuekan* [*Archive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1(1): 33-51。
- 陳慧女(Chen, Hui-nu)。2007。《遭受性侵害女性的母職經驗之研究》*Zaoshou xingqinhai nuxing de muzhi jingyan zhi yanjiu* [*Study of the Motherhood Experience of Females who were Sexually Abused*]。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論文(Kaohsiung shifan daxue fudao yu zishang yanjiusuo boshi lunwen) [Ph.D. Dissertation,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陳慧女、林明傑(Chen, Hui-nu, and Lin, Min-chieh)。2007。〈臺灣近二十年來性侵害研究之脈絡與趨勢〉“Taiwan jin ershinian lai xingqin hai yanjiu zhi mailuo yu qushi” [The Context and Tendency of the Research Regarding Sexual Abuse from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 Taiwan]。《台大社工學刊》*Taida shegong xuekan* [NTU Social Work Review] 14: 211-260。
- 陳慧女、廖鳳池(Chen, Hui-nu, and Liao Feng-tsu)。2006。〈家庭內性侵害受害者之性受害經驗、適應症狀與諮商介入情形之分析研究〉“Jiating nei xingqin hai shouhaizhe zhi xingshouhai jingyan, shiying zhengzhuang yu zishang jieru qingxing zhi fenxi yanjiu” [The Analysis of Sexually Victimized Experience, Adaptive Symptoms, and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Among the Incestuous Victims]。《諮商輔導學報：高師輔導所刊》*Zishang fudao xuebao: gaoshi fudao suok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 Guidance] 14: 102-139。
- 彭仁郁(Peng, Jen-yu)。2012。〈進入公共空間的私密創傷：臺灣「慰安婦」的見證敘事作為療癒場景〉“Jinru gonggong kongjian de simi chuangshang: Taiwan weianfu de jianzheng xushi” [Secret Trauma Going Public: Testimonial Narratives of “Comfort Women” as Healing Scenes]，《文化研究》*Wenhua yanjiu*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135-192。
- 。2014a。〈臨床田野：遇見異己者，把「人」找回來〉“Linchuang tianye: yujian yijizhe, ba ren zhao huilai” [Clinical Field: Encounter the Other, Bring “Humanity” Back]，收錄於《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Tonglixin, qinggan, yu huweizhuti: renleixue yu xinlixue de duihua* [Empathy, Affect and Intersubjectivity: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in Dialogue]，劉斐玟、朱瑞玲主編 (edited by Liu, Fei-wen, and Chu, Rucy-ling)，頁 69—110。臺北(Taipe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14b。〈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Guo bu qu de guogu: ‘weianfu’ de zhanzheng chuangshang” [The Past that does not Pass: War Trauma of Comfort Women]，收錄於《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Zhanzheng yu shehui: lilun, lishi, zbutijingyan* [War and Society: Theory, History,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汪宏倫主編 (edited by Wang, Horng-luen)，頁 435—513。臺北(Taipei)：聯經出版社(Linking)。
- 黃翠紋(Huang, Tsui-wen)。2013。〈我國性侵害防治政策推動現況及未來展望〉“Woguo xingqin hai fangzhi zhengce tuidong xiankuang ji weilai zhanwang”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Perspectiv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of Sexual Assault in Taiwan]，《社區發展季刊》*Shequ fazhan jik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142: 44-50。

二、外文書目

- Alayarian, Aida. 2011. *Trauma, Torture and Dissociation: a Psychoanalytic View*. London: Karnac Books.
- Alizade, Mariam. 2005. "Incest: The Damaged Psychic Flesh," in *On Incest: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iovanna Ambrosio, pp. 101-114. London: Karnac books.
- Arons, Judith. 2005. "‘In a Black Hole’: the (Negative) Space between Longing and Dread: Home-based Psychotherapy with a Traumatized Mother and Her Infant S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60:101-127.
- Assoun, Paul-Laurent, and Markos Zafiroopoulos. eds. 2002. *Anthropologie psychanalytique*. Paris: Anthropos.
- Aubry, Isabelle. 2008. *La première fois, j’avais six ans*. Paris : Oh éditions.
- Austin, Sue. 2009. "Jung’s Dissociable Psyche and the Ec-static Self," in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54(5): 581–599.
- Balier, Claude. 1999. *Psychanalyse des comportements sexuels violents : une pathologie de l’inachèvement*. Paris: PUF.
- Bidou, Patrice, Jacques Galinier and Bernard Juillerat. 2005. *Anthropologie et psychanalyse. Regards croisés*. Cahiers de l’Homme, n° 37. Paris: EHESS.
- . 1999. *Anthropologie psychanalytique. L’Homme : Revue française d’anthropologie*, vol. 39, n° 149, Paris: EHESS.
- Bion, Wilfred R. 1984[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Karnac Books.
- . 2007[1967]. *Second Thoughts: Selected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 Bonovitz, Christopher. 2009. "Mixed Race and the Negotiation of Racialized Selves: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for Internal Conflict," in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19(4): 426-441.
- Brasilier, Mathilde. 2015. *Il y avait le jour, il y avait la nuit, il y avait l’inceste*. Toulouse: Mélibée.
- Breuer, Josef, and Sigmund Freud, translated by Nicola Luckhurst. 2004[1895]. *Studies on Hysteria (Studien über Hysterie)*. London: Penguin books
- Chouvier, Bernard, and René Roussillon. eds. 2004. *La réalité psychique: psychanalyse, réel et trauma*. Paris: Dunod.
- Corcos, Maurice. *L’homme selon DSM: le nouvel ordre psychiatrique*. Paris: Albin Michel.

- Courtois, Christine A. 1996[1988]. *Healing the Incest Wound*. New York: Norton.
- Crocq, Marc-Antoine. 2000. "From Shell Shock and War Neurosis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History of Psychotraumatology," in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2(1): 47-55.
- Crook, L. S. and M. C. Dean. 1999. "Lost in a Shopping Mall: A Breach of Professional Ethics," in *Ethics & Behavior* 9(1):39-50.
- Drach, Marcel. ed. 2009. *Anthropologie, psychanalyse: les états de la structure. Figures de la psychanalyse*, 2009/1, n° 17.
- Ferenczi, Sándor. 1982[1932]. "Confusion de langue entre les adultes et l'enfant." In *Psychanalyse IV. Œuvre complètes (1927-1933)*, trad. par l'équipe du Coq-Héron, pp. 125-135. Paris: Payot,
- . 1982[1927-1933]. *Psychanalyse IV. Œuvre complètes, trad. par l'équipe du Coq-Héron*. Paris: Payot.
- Finkelhor, David, et al. 1990. "Sexual Abuse in a National Survey of Adult Men and Women: Preval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in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4(1): 19-28.
- Folch-Serra, Mireya. 1990. "Place, Voice, Space: Mikhail Bakhtin's Dialogical Landscape," i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8(3): 255-274.
- Frankel, Jay B. 1998. "Ferenczi's Trauma Theory,"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58(1): 41-61.
- Freud, Sigmund. Traduction par Rose-Marie Zeitlin. 1984[1933]. *Nouvelles conférences d'introduction à la psychanalyse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Paris: Gallimard.
- . 2001[1912]. *Totem et tabou*. Paris: Payot & Rivages.
- Freyd, Jennifer J. 1996. *Betrayal Trauma: The Logic of Forgetting Abu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2000.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esevoets, Yves-Hiram L. 1997. *L'enfant victime d'inceste: de la séduction traumatique à la violence sexuelle*. Bruxelles: De Boeck Université.
- Heald, Suzette, and Ariane Deluz. eds. 1994. *Anthrop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An Encounter Through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Herman, Judith Lewis. 2000[1981] *Father-Daughter Incest*.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7[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Janet, Pierre. 2004[1894].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état mental des hystérique*. Paris: L'Harmattan.
- Janin, Claude. 1995. "La réalité, entre traumatisme et histoire," in *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1995/1, 59: 115-132.
- Jones, Alice A. 2015. "Topographies: Psychic Landscapes in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and Tomas Tranströmer," in *American Imago* 72(4): 385-406.
- Julien, Lise and Isabelle Saint-Martin. eds. 1995. *L'inceste envers les filles: Etat de la situation. Monographie du Conseil du statut de la femme*, Québec.
- Khan, M. Masud R. 1997[1974]. "The Use and Abuse of Dream in Psychic Experience," in *The Dream Discourse Today*, edited by Sara Flanders, pp. 91-9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Kelly, et al. 1999. "Memory On Trial: The Use of False Memory Syndrome in Court," in *Fragment by Fragment: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Memory and Child Sexual Abuse*, edited by M. Rivera, pp. 155-178. Charlottetown: Gynergy books.
- Kendell, Robert and Assen Jablensky. 2003.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Validity and Utility of Psychiatric Diagnose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1): 4-12.
- Kilborne, Benjamin. 1998. "Ferenczi, Regression and Shame," in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7(4): 225-229.
- Klein, Melanie. 1984[1961]. *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The Writings of Melanie Klein* (Vol.4), edited by R. Money-Kyrle. New York: Free Press.
- Kristeva, Julia. 1991[1988]. *Étrangers à nous-mêmes*. Paris : Gallimard.
- Laub, Dori. 2013. "On Leaving Home and the Flight From Trauma," in *Psychoanalytic Dialogue* 23: 568-580.
- Le Guen, Claude. 1995. "Le principe de réalité psychique," in *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1995/1, 59: 9-26.
- Loftus, Elisabeth F. and J.E. Pickrell. 1995.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in *Psychiatric Annals* 25: 720-725.
- Maj, Mario. 2005.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an Artifact of Current Diagnostic Systems?,"

- aiririti
- i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6:182–84.
- . 2011. “Psychiatric Diagnosis: Pros and Cons of Prototypes vs. Operational Criteria,” in *World Psychiatry* 10(2): 81-82
- Molino, Anthony. ed. 2004. *Culture, Subject, Psyche: Dialogues in Psychoanalysis and Anthropology*. London, Philadelphia: Whurr Publishers.
- Parat, Hélène. 2004. *L’inceste*. Paris : PUF.
- Peng, Jenyu. 2009. *À l’épreuve de l’inceste*.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Racamier, Paul-Claude. 2010[1995]. *L’inceste et l’incestuel*. Paris: Dunod.
- Razon, Laure. 1996. *Enigme de l’inceste*. Paris: Denoël.
- Ricœur, Paul. 2008[1986]. “La psychanalyse confrontée à l’épistémologie,” in *Écrits et conférences, T. 1. Autour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Seuil.
- Rivera, Margo. ed. 1999. *Fragment by Fragment: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Memory and Child Sexual Abuse*. Charlottetown: Gynergy books.
- Roth et al. 1997. “Complex PTSD in Victims Exposed to Sexual and Physical Abuse: Results from the DSM-IV Field Trial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0(4): 539-555.
- Roussillon, René. 2001. “La question de la recherche et la psychanalyse : premiers repères épistémologiques,” in *Revue Belge de Psychanalyse* 38: 43-52.
- Salzbrenner, Stephen and Eileen Conaway. “Misdiagnosed Bipolar Disorder Reveals Itself to b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Comorbid Pseudotumor Cerebri. A Case Report,” in *Psychiatry* 6(8): 29–32.
- Selim, M., and O. Douville. eds. 2009. *Anthropologie, Psychanalyse et État.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n°116-117.
- Shengold, Leonard. 1989. *Soul Murder: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Abuse and Depriv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on, Bennett. 1992. “‘Incest: See under Oedipus Complex’: The History of an Error in Psychoanalysi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40: 955-988.
- Spiegel, David. 1994. *Dissociation: Culture, Mind, and Bod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Vigarello, Georges. 2000[1998]. *Histoire du viol. XIe–XXe siècle*. Paris: Seuil/Points.

- Wellton, Estela V. 2005. "Incest: a therapeutic challenge," in *On Incest: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edited by Giovanna Ambrosio, pp. 81-100. London: Karnac books.
- Winnicott, Donald W. 2000[1964]. *The Child, the Family, and the Outside World*. Lond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 1990[1965]. *The Maturation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London: Karnac Books.
- . 1989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Young, Allan. 1995. *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en et al. 2002. "Traumatic Exposur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Borderline, Schizotypal, Avoidant,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s: Findings from the Collaborative Longitudinal Personality Disorders Study," in *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 190(8): 510-518.
- Zophy, Angela Howard and Frances M. Kavenik. eds. 1990. *Handbook of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New York: Garland Pub.